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6年·第4期·总期: 182 + S\$5.00



从甘榜到AI时代 四代人的新加坡记忆与未来想象

- ◆ 淡墨鱼乐见心性 篆刻练达有文章——艺术家陈振文印象
- ◆ 舞步未止 探索不息——吴慧英的舞蹈旅程
- ◆ 往山中走去——林高专访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9 770219 197006 >

(封面图片由AI辅助生成)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电话: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编辑语

文·欧雅丽

六十一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不算漫长，但对于人的一生而言，却足以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65年独立至今，新加坡从资源有限的小岛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都市。甘榜和亚答屋渐渐退出生活，组屋拔地而起；从固定电话、传呼机到智能手机，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科技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彼此联系的方式。

配合新加坡建国61周年，本期杂志策划专题“从甘榜到AI时代——四代人的新加坡记忆与未来想象”，邀请四位不同年代的受访者，从各自的人生经历出发，回望过去，也畅想未来。

1940年代出生的李奕志博士经历过日据时期、甘榜生活与独立建国，更懂得安居乐业的来之不易；1960年代出生的黄保华见证新加坡工业化，在经济起飞中寻找机会；1980年代出生的沈斯涵伴随组屋与互联网成长，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怀念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二十多岁的陈思静成长于数码时代，在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中，思考如何保持独立判断。

时代不同，四代人的答案却有不少交集。家庭、邻里温情、多元文化、社会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都是他们希望未来能够保留的东西。科技不断更新，城市不断改变，一些朴素的价值观念，却在不同世代的讲述中反复出现。回望过去，不只是为了怀旧，也是为了思考，有什么不应该在前行中被遗落。

本期其他篇章，同样记录着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面貌。画家陈振文将童年的甘榜记忆诉诸画笔，作家林高以文字书写南洋风景，年轻舞蹈家吴慧英探索华族舞蹈与现代舞融合的可能；南华多元种族文化节则让不同族群的传统戏剧相遇、交流，在彼此借鉴中焕发新的活力。

从甘榜到人工智能，改变的是生活环境与方式，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选择与创造。或许多年以后，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也会成为下一代人口中的“从前”。在不断前行的同时，珍惜一路走来所积淀的文化与价值，或许正是国庆之际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课题。

2026年·第4期·总期：182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总编辑■

欧雅丽

■编辑■

陈洁莹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DDI (P) 063/11/2025

■出版■

2026年8月

支持机构：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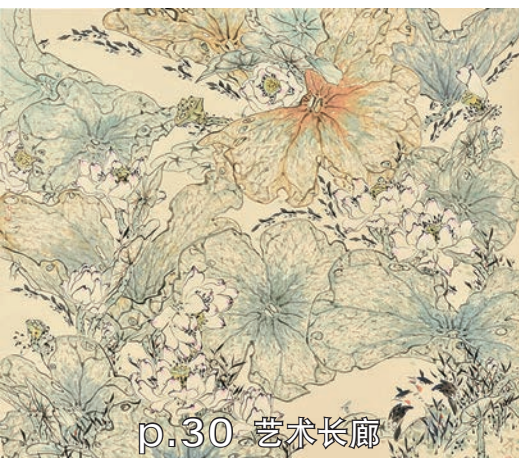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會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国庆特辑 从甘榜到AI时代 欧雅丽、陈洁莹
—— 四代人的新加坡记忆与未来想象
- p 6 李奕志：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求发展
- p 8 黄保华：礼义廉耻最能代表华人的价值观
- p 10 沈斯涵：希望新加坡依然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
- p 12 陈思静：不要只追求物质上的成功
- p 14 炊烟岁月 柚香漫开的时节 尤今
- p 17 文坛掠影 往山中走去 齐亚蓉
—— 林高专访
- 22 戏如人生 舞步未止 探索不息 章秋燕
—— 吴慧英的舞蹈旅程
- 26 余音缭绕 弦歌不辍 乐韵长流 郭永秀
—— 两位华乐人巫振加与郑重贤的艺术人生
- 30 艺术长廊 淡墨鱼乐见心性 篆刻练达有文章 赵宏
—— 艺术家陈振文印象





p.30 艺术长廊



p.22 戏如人生



p.54 最爱书房

- p 35** 狮城艺事 法国喜剧在新加坡戏曲舞台上的双壁 蔡曙鹏
- p 40** 吾乡吾族 金门籍海峡华人王三龙家族 陈煜
- p 44** 文化百科 歌舞团与早年新加坡的娱乐事业 叶舒瑜
- p 48** 社团聚焦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欧雅丽
—— 首届南华多元种族文化节圆满落幕
- p 50** 总会专递 姓氏宗亲会馆领袖与徐芳达部长午餐交流会 陈洁莹
- p 52** “爱国歌曲大家唱” 迈入第20年
千人同声唱响家国情怀 陈洁莹
- p 54** 最爱书房 在文字里慢慢《懂得》 林映慧
- p 56** 仿佛风 咖啡乌 翁维才
- p 58** 本土文学 诗三首 林高
- p 60** 旧貌新颜 淡滨尼北：淡滨尼镇的绿芽新枝 李国樑

从甘榜到 AI时代

四代人的新加坡记忆与未来想象

从甘榜木屋到高楼林立，从黑白电视到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值此建国61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受访者，以他们的人生故事，勾勒新加坡从甘榜时代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轨迹，并分享他们对于成长、文化、身份认同、科技发展与未来社会的思考。

这是四个人的人生故事，也是四代人的集体记忆；这是一次关于过去的回望，也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对话。

“四个人，四个时代，一座不断成长的城市；而属于新加坡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1940s
甘榜岁月

战后初期，生活简朴，
邻里守望相助，
共建家园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

四代受访者回答了同样的15个问题，我们从中选出了8个。如果是你，你又会如何回答？也许多年以后，你的答案，也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记忆。

- ① 您成长的新加坡是什么样子的？
- ② 回顾您的成长历程，您认为哪个时代变化最深刻？
- ③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 ④ 有没有一些您希望新加坡能一直保留下来的东西？
- ⑤ 在您心中，什么最能代表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 ⑥ 华语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是身份、文化认同，还是沟通工具？
- ⑦ 您认为AI会为社会带来哪些机会？又有哪些令人担忧的地方？
- ⑧ 您认为二十年后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样子？

建国一代

1940s
李奕志 博士

出生于日本占领时期。在三巴旺甘榜长大，见证了新加坡从贫穷落后走向独立建国与经济腾飞的历程。长期从事媒体与教育工作，年逾七旬重返校园，以研究与写作重新追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



1960s 建国与奋斗

独立建国，组屋兴起，
教育普及，
国家迈向现代化

1980s 经济腾飞

工业化加速，
国民生活改善

2000s 全球化与数码化

互联网普及，
全球联系紧密，
多元文化共融发展

2020s AI时代

人工智能崛起，
科技重塑生活，
人类面临新的选择与想象

独立之子

1960s 黄保华 先生

1961年出生，
成长于裕廊甘榜，
亲历新加坡建国初期的
奋斗岁月。
白手起家创办企业，
深受华校教育熏陶，
秉持回馈社会的精神，
长期积极参与华社事务，
并在多个社团机构
担任要职。



千禧一代

1980s 沈斯涵 先生

1984年出生，
在组屋中长大，
成长于全球化与
数码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理工科出身，
却走进媒体与公共服务领域；
热爱历史文化的他，
长期活跃于多个宗乡
与文化团体，
并创立清史研究学会。



Z世代

2000s 陈思静 女士

2004年出生，
数码时代原住民，
成长于互联网与社交
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
因热爱华文，
在理工学院修读中文
相关专业；
毕业后短暂投身职场，
其后获得宗乡总会奖学金，
赴北京大学继续深造。



李奕志：

居安思危 在逆境中求发展



1943年，李奕志出生于日据时期的新加坡。此时，英军向日军投降已一年有余，新加坡正步入近代史上最动荡的岁月。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完整地覆盖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日据时期、殖民统治时期、自治时期、独立建国时期、工业化时代、全球化时代，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

作为资深报人、企业管理者、学者与研究者，他不仅见证了历史，也参与了历史。某种意义上，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版的新加坡现代史。

甘榜岁月：多元共生的童年底色

李奕志出生时，父母住在牛车水武吉巴梳路，后来迁往三巴旺西山园附近。那里靠近英军海军基地“军港”，许多居民都在那里工作。人们住的是亚答屋和锌板屋，多户人家共用冲凉房和厕所，尤其是共用旱厕，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

大人忙于生计，孩子们则在泥地里奔跑，在沟渠里摸鱼，玩着自制玩具。甘榜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比邻而居；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等不同籍贯的华人也和睦相处，邻里之间遇事互相帮助、彼此扶持。

李奕志的父母是广东来的移民，分别说粤语和客家话。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上与不同族群长期相处，他从小便学会了马来语、福建话、客家话和广东话。在那个年代，语言不是课堂里的一门课程，而是生活本身，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连接。

然而，童年的回忆并不只有温情，也有时代留下的艰辛。后来，他从母亲口中得知，日据时

期物资极度匮乏，母亲外出做工带回一些木薯粉，他便靠着这些食物活了下来。为了养活一家七口，父亲在路边摆摊售卖纺织品和干货，不仅收入微薄，还要面对市场管理人员、警察和私会党的层层盘剥。尽管生活清贫，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却让那个时代的人们得以共同渡过难关。

风云激荡：在时代转折中寻找方向

李奕志走的是典型的华校教育道路：小学就读于西山公学，中学进入华侨中学，高中进入育英中学。

当时的华文教育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脉络，教材多来自中国，《诗经》《论语》以及唐诗宋词都是学生们熟悉的经典。对于许多华校生来说，中国不仅是祖辈魂牵梦萦的故乡，也是精神上的原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正处于政治风云激荡的时期。自治运动兴起，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学生们热烈讨论国家、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使没有亲身参与，也难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

然而，历史的发展远比理想更为复杂。自治运动、独立建国、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不断重塑着这一代人的认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尽管自己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但根已经深深扎进南洋的土地之中。新加坡不再只是谋生之地，而是真正的家园。

于是，“华侨”逐渐成为“华人”。一字之差，却折射出身份认同的深刻转变。

多年以后，李奕志重返校园，前往厦门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并以《历史的抉择——“二战”后新加坡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为题，系统梳理本地华人从“落叶归根”走向“落地生根”的历史进程。

与时俱进：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离开校园后，李奕志先后进入《民报》和《星洲日报》工作。那时，记者依靠纸笔记录新闻，排版则要由工人将一个个铅字嵌入印刷模板，耗时耗力。

工作之余，他始终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白天工作，晚上进修，先后完成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士课程、英国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并取得澳洲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1995年，距离当时的退休年龄只剩三年时，52岁的他毅然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参与《南华早报》的业务重组工作。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他不仅要面对媒体经营问题，也要适应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复杂的人际关系。

八年后，他受公司委派前往上海担任中国业务顾问，后来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导师。退休之后，已到古稀之年的他再次回到校园，完成历史学博士学位。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不断迎接挑战，成为他这一代人最鲜明的时代印记。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他认为，新加坡最成功之处在于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公共住房政策让昔日的亚答屋和锌板房逐渐被现代组屋取代。1960年代结婚后，他搬离三巴旺甘榜，入住大巴窑的一室一厅组屋，自来水和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活的改变。



李奕志在报馆工作，那时的电脑仍是旧式电脑。

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纺织业、造船业等产业迅速发展，人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医疗体系逐渐成熟，新加坡也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化都市。

在他看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从资源匮乏的小岛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稳定、政府廉洁，以及务实高效的治理方式。

守护根脉：在传承中保持开放

面对时代巨变，李奕志认为，有两样东西必须保留下来：家庭观念与方言文化。

他始终相信，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人之间的扶持与牵挂，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依靠。而方言所保存的，则是不同族群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根脉。

与此同时，他也坦言，新加坡社会正面临新的挑战。家庭观念逐渐淡化，方言环境日益萎缩，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旦有人刻意煽动，社会矛盾便可能被迅速放大。因此，种族和谐需要长期而持续的维护。

面对未来：居安思危，逆境成长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他也开始主动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行业与工作机会，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们都必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谈及二十年后的新加坡，他坦言自己“不敢想象”。经过六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新加坡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突破既有的发展模式，如何在全球竞争中继续保持活力，都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

采访结束时，我们请他留下一句话，送给未来的新加坡，也送给年轻一代。

他写下十一个字：“居安思危，在逆境中求发展。”

这不仅是他人的人生信条，也是属于新加坡这一代建设者的人生经验。

从甘榜到人工智能时代，从依靠木薯粉充饥到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八十余年间，城市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不断更新，而支撑一个社会不断前行的信念，却始终未曾改变。

黄保华：

礼义廉耻最能代表华人的价值观

如果将六十五岁黄保华的人生展开来看，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几乎与新加坡的现代化历程重叠在一起。

1961年，他出生于裕廊一带。祖辈多年前从福建安溪南来，一代代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

黄保华儿时居住的甘榜，位于今天立化中学对面一带。如今，这里有文礼地铁站、裕廊坊（Jurong Point）、高耸的组屋和四通八达的道路；但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仍是一片乡野景象，遍布农田、木屋和泥泞小路。

当时，他居住的亚答屋经常漏雨，每逢下雨，他便要爬上屋顶，用日历板堵住缝隙。这些看似寻常的片段，构成了他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甘榜岁月：在清贫中学会担当

谈起童年，黄保华笑称自己是“半工半读”。

父母终日忙于务农，作为家中长子，他很早便学会承担责任。放学以后，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家帮忙，除草、养猪等农活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回忆起最难忘的一件事，他想起自己十一岁时收到的一份善意。

当时，他花一毛钱买了一碗浇上卤汁、可以免费添饭的白饭。一位工头见状，不仅把这一毛钱还给了他，还另外拿出两毛钱，为他添了一盘菜。

三毛钱，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当年却弥足珍贵。这件事让他深受触动，也让他暗下决心：将来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别人，并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工业浪潮：与国家一起成长

黄保华成长的年代，也正是新加坡快速发展的时期。

1960年代，新加坡面临住房短缺、高失业率等问题。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工业化，而裕廊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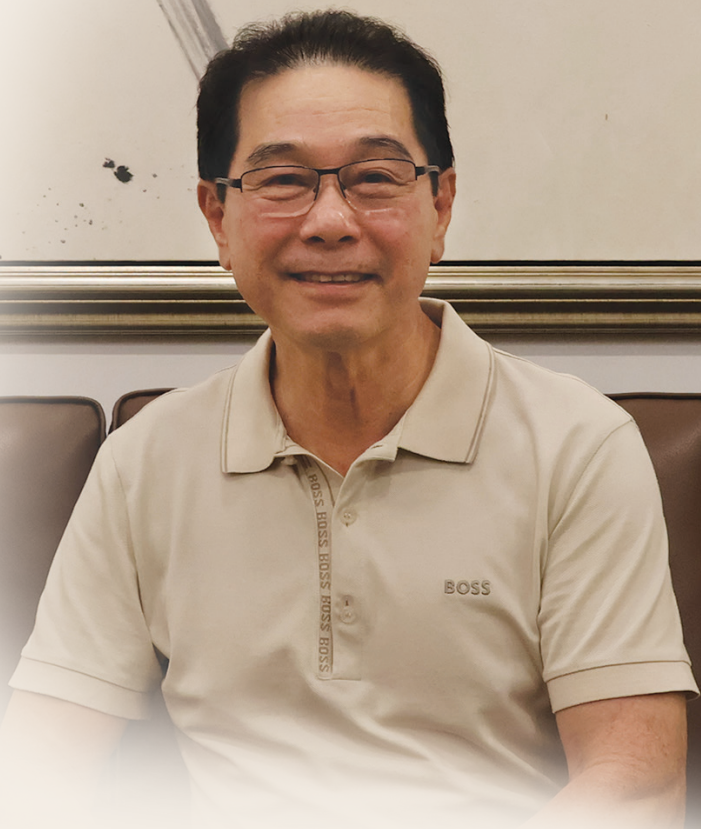
随着工业区不断扩建，昔日的农田、木屋和锌板房逐渐被道路和工厂取代，许多原本务农的人也开始走进工厂。

工业化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也改变了黄保华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从小接受华文教育的他，以优异成绩从孺廊小学升入华侨中学。对当时的华校生来说，南洋大学承载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理想，也是许多人的梦想，黄保华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随着教育制度不断调整，1978年刚升入高中时，他得知南洋大学即将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原本规划好的升学道路也随之改变。最终，他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修读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后，他先在一家英国公司担任技术人员，几经辗转之后走上创业道路，投身船舶与工业设备及用品行业。在他看来，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与尊重，因此，无论大小事务，他几乎都亲力亲为。



“我当时亲自跑船厂，经常要爬上十多层高的大船，再下到二十多层楼深的船舱。”

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创业者的艰辛，也展现出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坚韧务实的精神。

从甘榜到组屋：改变的不只是居所

1985年，成家后的黄保华搬离甘榜，迁入武吉巴督的一套四房式组屋，而父母则住在附近另一座五房式组屋。

与过去相比，组屋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但黄保华坦言，自己刚搬进去时并不习惯。

过去，邻居之间彼此熟识，家家户户经常串门聊天，谁家遇到困难，大家都会主动帮忙。搬进组屋之后，一面面墙和一扇扇门把人们分隔开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昔日的“甘榜精神”，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淡去。

几十年后，相似的情况又出现在互联网时代。通讯技术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但黄保华却觉得，人们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远了。如今，人们不必见面，甚至不必听见彼此的声音，便能在几秒钟内传递信息。

相比之下，他仍然更喜欢打电话，或是面对面交流，因为声音、表情和语气之中，蕴藏着机器无法取代的温度。

AI时代：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思考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也让黄保华对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思考。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整理资料、归纳信息、规划行程，减轻重复性的工作负担，就像一个随时待命的助手。

不过，他也始终保持着警惕。他担心，人们如果长期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尤其是年轻一代，更需要培养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他说：“AI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

守护传统：什么才是不该失去的？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黄保华认为，新加坡最大的成就，是从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发展成为区域金融、航空和航运中心。与此同时，他认为，基础工业始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不应被忽视。



1985年黄保华结婚，那时候流行去裕华园拍结婚照

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一些无法用经济数字衡量的东西，其实更加珍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家庭观念。“家是我们的根，也是港湾，是每一个人的基础。”

因此，他始终十分重视农历新年。在他看来，这是华族文化中最重要节日，不仅象征团圆，也维系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他同样珍视华语和方言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对他而言，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连接祖辈、连接文化传统的重要纽带。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未来二十年的新加坡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经历了甘榜时代、工业化浪潮、经济腾飞、互联网时代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他比许多人更深刻地明白“世界瞬息万变”的这一规律。

因此，比起想象未来会变成什么模样，他更关心的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之中，还有什么东西不应该改变。

采访结束时，他将想对年轻人说的话浓缩成四个字：“礼义廉耻。”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套传统伦理观念，也是一种做人处世的原则：待人有礼，处世有义，为人清廉，也要懂得分辨什么事情不可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间小路变成了宽阔大道，亚答屋变成了高楼大厦，许多熟悉的风景早已消失。然而，在黄保华看来，有些东西不应随着时代远去，那就是家庭观念、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礼义廉耻”所代表的价值准则。

沈斯涵： 希望新加坡依然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

沈斯涵对童年新加坡的记忆，是从组屋走廊开始的。小时候，他家对面住着一个同龄男孩。两个人不用走出家门，只要站在各自门口，就能隔着走廊聊天、玩玩具。

1984年出生的沈斯涵，属于在组屋区长大的一代新加坡人。在他的成长年代，电梯、自来水、巴士和学校已是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存在，新加坡也正加速迈向现代化、资讯化社会。

从固定电话、传呼机、个人电脑，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四十多年间，生活越来越便利。然而，回望成长经历，他最怀念的却是人与人之间曾经拥有的亲近与连接。用他的话说，那是一个“不那么便利，却很有温度的新加坡”。

组屋童年：延续下来的“甘榜精神”

沈斯涵从小在新加坡东部长大，从勿洛到淡滨尼，再到白沙，成长的足迹始终没有离开组屋社区。祖父母原本居住在山上的甘榜，后来随着



城市发展迁入组屋。到了他这一代，组屋生活早已成为日常，但上一代从甘榜延续下来的邻里关系并没有立即消失。

那时候，邻居彼此熟识，也习惯互相关心。在电梯里碰见，会问起孩子考试考了几分，如果成绩不理想，还会主动介绍补习老师。人与人之间不像今天这样有明显的边界感。在沈斯涵的记忆中，那时的人们比较简单、淳朴，组屋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当时没有智能手机、网络购物和外卖平台，生活远没有今天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却更加频繁。在他看来，这正是从甘榜延续到组屋社区的“甘榜精神”。

随着城市发展，邻里往来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对此，他有一句形象的概括：“以前，我们住得比较近；现在，我们住得比较高。”

资讯时代：从传呼机到互联网

沈斯涵上小学时，正值1990年代初电脑和互联网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大概在1993年，他家买了第一台电脑，一开始只能打字。后来接入互联网，那时还是拨号上网，只要电脑连接网络，电话线路就会被占用，一有人打电话，父母便知道孩子又在偷偷上网。

到了中学，传呼机开始流行，不久又被手机取代。网吧也成为年轻人的聚会场所，放学后，朋友们会相约去打游戏。



沈斯涵小时候在圣淘沙留影，身后的景观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代人的成长，仿佛不断升级的软件：从固定电话到手机，从电脑、互联网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理工科到华文媒体：跟随自己的热爱

如果只看后来的履历，很难想象沈斯涵曾是一名理工科学生。中学毕业后，他进入理工学院修读机械与电子工程相关课程，但因为并不真正喜欢理工科，学得颇为辛苦。

当时，一位中学同学因英文成绩不理想，被分流到工艺教育学院（ITE）。在沈斯涵看来，对方华文能力出色，表达能力也很强，只是这些特质无法通过考试成绩体现。他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投稿《联合早报》，提出一个人的价值不应只由成绩衡量。文章刊登后，一位国会议员还在国会辩论中引用了他的观点。

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不仅能够记录现实，也可能产生影响。

沈斯涵从小华文成绩不错，中学时还担任过《联合早报》学生通讯员。一次参加宗乡总会举办的中华文史常识达标考试，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得知他喜欢写作，笑着说：“那你就是兼职作家了。”这句话给了年轻的他很大鼓舞。

后来，他从学生记者一路成为电台记者、报馆记者、电视编导，并取得上海复旦大学汉语系本科学位。多年来，他持续投入文化与历史研究，创办了清史研究学会，也积极参与多个文化组织和宗乡团体。

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他常常提起的一句话。对他而言，热爱一件事，有时比擅长更重要。

多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十多年的媒体经历，让沈斯涵从不同角度观察新加坡。在他看来，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正是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

童年时，他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一起踢球、玩耍，孩子们不会按照种族分组，而是按照住在哪一栋楼决定谁跟谁一队。服兵役时，身边也有不同族群的同胞，其中一位还是来自中国广东的新移民。多年后偶然重逢，对方依然热情地拥抱他。

在沈斯涵看来，新加坡人的成长，本来就是不断与不同族群相处的过程。日常交流中，英语、华语、马来语也常常自然地夹杂在一起。多

元文化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默契。

如今，人们对于种族、宗教和身份认同更加敏感。在他看来，尊重固然重要，但包容并不意味着彼此疏远。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同时自然相处，是社会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AI时代：便利之外，还有什么？

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生活。沈斯涵并不排斥新技术，但比起效率，他更关心的是：当一切越来越便利，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些什么？

有一次下大雨，他从家中经过有盖走道和天桥，一路走到巴士站，竟完全没有淋湿。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如今的生活已经便利到连雨伞都可能不再需要。

手机几乎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人们却未必知道隔壁住着谁；过去到熟食中心买饭，老板会主动问候近况，如今透过手机下单，人与人的交流也随之减少。在他看来，社会需要更多温情，“人要有高度，也要有宽度和温度”。

在中国工作的几年，则让他重新感受到竞争带来的危机意识。他认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新加坡人都应该有大局意识，也不能失去危机感，在追求进步与效率的同时，共同营造一个更有温度的社会。

面向未来：奋斗、寻觅、追求

谈到未来，沈斯涵认为，人工智能将更加普及，与生活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过，如果人们把所有决定都交给AI，同样令人担忧。

如果说科技发展是“硬件”，那么他更关心社会的“软体”。他希望未来的新加坡依然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而“脑大心大”，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状态——人的知识越丰富，心胸也应该越开阔，更能包容不同的人和事。

如果要送给年轻人一句话，他用了十个字概括：“奋斗、寻觅、追求、永不妥协。”

这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体会：不要因为别人说一件事不会成功，就轻易放弃，真正去尝试了，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从理工科走进华文世界，从新闻现场走向文化与历史研究，他的人生并非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前进。一路寻找、一路尝试，也一路坚持，或许正是他对“奋斗、寻觅、追求、永不妥协”最真实的实践。

陈思静：

不要只追求物质上的成功

2004年出生的陈思静，将自己成长中的新加坡形容为一个“安全、方便、高效而有秩序的城市”。即便凌晨走在街上，常亮的路灯和熟悉的环境，也让她很少感到需要处处防备。升上中学、理工学院以后，几分钟一趟的地铁，让她对这里的“高效”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自觉排成一列的新加坡人，也让她感受到这座城市特有的秩序感。

作为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Z世代，陈思静这一代经历的新加坡变化，更多发生在屏幕之后。

数码成长：从纸质表格到掌上生活

陈思静的童年还没有智能手机。小时候，家里用的是厚重的电视，母亲用数码相机给她拍照后，也习惯将照片冲洗出来。她还记得，小学入学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很多时候需要填写纸质表格。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生活已经悄然改变。小六会考毕业前后，查询成绩、填写升学志愿、查看录取结果等流程，都逐渐转到了网上。

2014年，新加坡提出“智慧国”计划，希望通过数码技术改善交通、教育、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这些宏大的国家发展规划，落实到陈思静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就是那些过去需要排队、填表、亲自办理的事情，渐渐只需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便能完成。

升上中一后，她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和电脑。Snapchat、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也开始进入她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让沟通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但她也逐渐发现，“手机不离身”似乎让真实的人际接触变少了。相比每天隔着屏幕聊天，她还是更喜欢与朋友面对面相处。



疫情来袭：在独处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2020年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放大。

当时，陈思静刚升上中四。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危机，看到人们到超市抢购物资，她也曾一度感到恐慌。

随着新加坡进入“阻断措施”时期，学生开始居家学习，原本熟悉的校园生活突然暂停。即使偶尔需要回到学校，大家也必须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距离，遵守各种防疫规定。少了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她觉得学习气氛变淡，进度也受到影响。

然而，这段特殊经历也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成长空间。过去的她比较习惯“跟着大家走”，但居家学习让她拥有了更多独处和思考的时间。临近中学毕业，她开始主动查找不同院校和专业的资料，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

后来，她选择进入义安理工学院修读中文系商务专业，2025年又前往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

AI时代：方便之外，更需要独立思考

2022年底，ChatGPT问世，陈思静第一次接触到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今，她也会使用AI工具询问与学习和专业相关的问题。在她看来，AI最大的优点，是能够迅速整理资料，并从不同角度提供参考。

但对于AI，她始终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在享受“方便”和“高效”的同时，她渐渐发现自己开始依赖它。有时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再是自己思考，而是打开AI。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开始刻意关掉工具，要求自己先想一想，再决定是否需要借助人工智能。

她担心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们会不会在长期依赖技术之后，逐渐失去甄别信息和独立判断的能力。

国家记忆：从SG50认识“新加坡人”

陈思静成长过程中另一段鲜明的记忆，发生在2015年。

那一年，正读小学五年级的她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国庆预演。新加坡迎来独立五十周年，整个社会沉浸在SG50的纪念氛围中；然而同年3月，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全国进入七天哀悼期。

当时年纪尚小的她，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对新加坡意味着什么。她只记得电视画面中的悲伤气氛，以及国庆预演现场众人肃穆的一刻。

一喜一悲，两种截然不同的集体情绪发生在同一年，也第一次在她心中种下了“国家”的概念。

随着年龄增长，她开始思考，新加坡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而“我是新加坡人”又意味着什么。后来离开新加坡到海外求学，她对这句话有了更具体的体会。

一些在新加坡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到了国外反而显得特别。例如排队——买食物要排队、购物要排队，甚至买马票也要排队。没有人特别提醒，大家却仿佛默认遵守着这套公共秩序。

她也越来越意识到，多元文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从小在新加坡成长，她习惯身边有不同种

族的同学，了解彼此的节日、食物和一些文化习俗。新加坡长期通过学校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促进不同族群的接触与融合，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也被视为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

因此，当被问及希望未来的新加坡保留什么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多元与包容。

走出国门：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根脉

到北京求学，也让陈思静重新认识自己的华族身份。

她发现，一些自己从小熟悉的华人新年习俗，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人的传统。例如新马华人过年时“捞鱼生”，或带着两粒柑到亲友家拜年，都是南洋华人社会发展出来的地方特色。

华语对她而言，也因此不再只是学校里的“母语科目”。虽然父母主要接受英文教育，她却从小对华语有浓厚兴趣，后来更选择中文作为专业方向。到北京以后，华语也成为她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华人交流的共同语言。

语言让她逐渐明白，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传承，就像华族文化来到新加坡以后，在一代代人的生活中不断演变，最终形成属于本地华人的文化表达。

谈到最希望保留下来的华族文化，她想到的是家庭、社群，以及诚信、责任感等价值观。她也很认同长辈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人更需要一些稳定的关系，提醒自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

面向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当被问到二十年后的新加坡会是什么样子时，陈思静相信，未来的社会大概会更加先进，也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加包容。

不过，比起经济还能增长多少、科技还能发展多远，她更在意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

她希望未来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机会探索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寻找生活的意义，并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而不是一味追随一条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固定道路，不要只追求物质上的成功。

对于成长于数码时代的陈思静来说，科技或许还会不断改变生活的方式，但如何使用科技、如何认识自己、又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最终仍然需要每个人自己寻找答案。

(本专题由本刊总编辑欧雅丽、编辑陈洁莹撰稿)





柚香漫开的时节



文·尤今

对 那风味绚烂的柚子皮焖肉，我念念不忘；然而，自从婆母辞世后，我便无缘再尝了。

每年中秋节前后，是怡保柚子的盛产期，柚子一上市，她便意兴勃勃地赶去挑选。柚子在水果店里堆积如山，凝集了一整个季节的饱满与圆润，给人一种富足贵气的感觉。她挑选柚子，看、闻、触，三者缺一不可。她的首选是那些果皮在青翠中晕染着些许淡黄色而又散发着清新香气的。选好以后，再用手一一去按，以紧实而有弹性者为佳。当然，选柚子最为关键的是必须掂重量，越重越好——那些沉甸甸者，说明水分充足、果肉紧实。“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有了

婆母严谨的把关，果贩休想以次充好，柚子更别妄想滥竽充数。

把几大箩筐闪着亮泽的柚子带返家门后，她便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将柚子一个一个地在木板上整整齐齐地码好。之后，在柚子上面铺上坚实的纸板，再摆一层。婆母凭经验知道，柚子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回糖”，变得更甜美更可口。

一百多个柚子汇集而成的香气处处飘散，忽紧忽散，时隐时现。到访客人惊诧地问道：

“哎呀，你几时当上了柚子批发商？”

婆母淡淡笑道：

“儿孙几十人回来过中秋，人人都说要吃柚

子，又说要送给谁谁谁，再多也不够分配呢！”

怡保的柚子遐迩闻名，与地理环境和土壤条件是息息相关的。

怡保地处石灰岩山区一带，土壤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排水性强；加上阳光丰沛，昼夜温差适中，适合果树的生长。其中最重要的是，怡保拥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周围工业污染较少，致使柚子在生长过程中得以保持纯净的风味、细腻的质地和饱满的果汁。

中秋节，我与家人们抵达怡保后，一进入婆家的大门，柚子波澜壮阔的香气便如骤降的大雨，彻头彻尾地把我们“淋湿”了。

刚一坐定，婆母便端来了大家引颈期盼的柚子。她手势利落地用刀子沿着柚子的中央团团切割，划出一道深浅适中的线，再以手用力掰开，把整个雪白的柚子从厚厚的皮中取出来。这时，孩子们都涌上前来，抢那两个半圆形的柚子皮，戴在头上当帽子，呵呵，那是香气氤氲的帽子啊！有时，他们也会用这半球形的柚子皮盛水来喝，怡保的水质原本就无比清甜，再加上隐隐约约的柚子香，更让人喝得欲罢不能了。

接着，婆母撕掉了柚子瓣外的薄膜，粒粒分明的柚子肉晶莹剔透，一触即破，四溅的汁水甘甜里掺着清新的酸味，让人不由得想起绽放于幽谷的花，不曾沾染任何世俗的尘气。大家一瓣一瓣地掰来吃，吃的是故乡的水果，吞咽的却是故乡浓浓的情。

婆母远到南洋生活以前，在海南岛文昌县的村庄里从事农务，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因此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在那个荤食匮乏的时期，西瓜皮、萝卜皮、南瓜皮、橘子皮，都被充分利用了。

婆母津津有味地忆述：

“用虾米快炒西瓜皮，嫩嫩脆脆的，非常开胃。南瓜皮煎蛋，香气浓郁，下饭最好。橘子皮晒制成陈皮，是百搭调味品。至于腌制萝卜皮呢，风味独特，百吃不厌呢！”

“萝卜皮如何腌制呢？”馋嘴的我赶紧问道。

婆母耐心指导：

“萝卜皮洗干净，切成条状，加入适量的盐拌匀，腌三十分钟，让萝卜皮出水；然后用清水冲冲，再挤干水分。接着，以盐、糖、醋、生抽、蒜片和辣椒油腌制，隔天便可以吃了。这萝卜皮啊，又酸又咸又甜，口感爽脆，配粥吃，最开胃！”

婆母将“物尽其用”的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移居怡保，看到柚子皮被大家弃如敝屣，深觉暴殄天物，于是，她以巧思妙手将别人眼中一无是处的柚子皮脱胎换骨，化成了另类美食。

柚子皮——尤其是文冬柚^[注]，暗藏香气，吸味能力极强，宛若海绵，特别适合焖、煮、炖和糖渍。然而，在用以烹饪前，必须经过特别的处理，以便去掉附在柚子皮上面那股苦涩的味道。

婆母将柚子皮切成块状，以盐水浸泡，反反复复地挤压出苦水；继而焯水一两次，再把水分挤干。经过这几个步骤之后，苦味便去得七七八八了。

柚子皮腌以生抽、老抽、蚝油、糖、绍兴酒、胡椒粉。之后，在锅中放少许油，下五花肉，小火慢煸，把油逼出来，再倒入处理好的柚子皮、干辣椒和陈皮，翻炒均匀，加水，慢火焖大约一个小时。最后，开大火收汁，当汤汁变得浓稠而闪出诱人的亮泽时，便大功告成了。

柚子皮海纳百川，饱饱地吸满了肉汁，软而不烂，味道芳馥；五花肉肥者不腻、瘦者不柴，被柚子皮的清香密密地缠绕着，正是“我中有你而你中有我”，缠绵缱绻。

每当这一道菜端上桌时，大家的筷子都不约而同地伸向了柚子皮，而柚子皮，正是个中灵魂啊！

有一回，婆母突发奇想，让朴实的柚子皮和奢华的鲍鱼相配搭。然而，布衣嫁入豪门，生活观和价值观毕竟有差距，难以达致水乳交融的境界——柚子皮谦和内敛，不爱强抢风头；而心有城府的鲍鱼呢，又深藏不露，不像肉类般大鸣大

放，两者结合，摆明是“同床异梦”。黄粱梦醒时，柚子皮是柚子皮，鲍鱼是鲍鱼，两不相干，各自冷淡，分道扬镳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乱点鸳鸯谱，下场总是悲剧。

中秋节过后，空晃晃的柚子皮满满地堆在箩筐里，善于变通的婆母便用它们做成糖渍柚子皮。

她将柚子皮内的白瓢除得干干净净，重复上述的程序以将苦味释出。之后，将柚子皮切成细条，以文火慢煮，让糖分逐步渗进去，水分收干后，柚子皮变得澄亮透明一如水晶。摊放在外，让它自然冷却；随后密封冷藏，可放几周不坏。

糖渍柚子皮的味道，富于层次——初入口，有一股清新的甜味，柔韧略带嚼劲；慢慢咀嚼时，溢出于唇齿间的，是柚子若有若无的香气，夹杂着一缕淡淡淡淡的苦味；吞咽之后，回甘悠久，犹如余音，回响袅袅不绝。

每家分得一大罐，不啻拱壁地带回家。看书时就放在桌上，闲闲地读、慢慢地嚼；在满嘴的柚子香气里，脑子总会不期而然地浮起南宋诗人陆游那首描绘恬静乡居的五言律诗：

何许是吾庐？南临古镜湖。
园林垂橘柚，门巷落楸梧。
床稳龟无息，巢新鹤有雏。
邻翁殊耐久，有酒即相呼。

诗中这两句“园林垂橘柚，门巷落楸梧”，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充满了图画的美感。园林内橘子树和柚子树结实累累，肥硕光艳，无限丰美；然而，门前瘦瘦的巷子，楸树和梧桐树枯朽的落叶却铺满一地。作者巧妙地通过对比的手法把秋天的繁盛与颓败这两种极致的景色交织在一起。这幅静中有动的图画，一方面兴高采烈地展现了秋天的丰饶圆满；另一方面，又婉约含蓄地道出了岁月不可避免的凋零萧杀。作者写的是实景，反映的却是他自己在看透世情的晚年里那种随遇而安的洒脱心态——既然盛与

衰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然现象，我们既不必为繁盛而欢欣，也不必为颓败而伤怀，一切都该以平常心来看待。

此刻，我嚼着香甜润喉的糖渍柚子皮，也嚼着隽永不朽的古诗情，双重享受，人生至乐也。

我三个稚龄的孩子都不喜欢糖渍柚子皮，对于不谙世情的他们来说，那一丝丝暗藏于柚子皮里的苦味，是陌生的，他们很是抗拒。我想，人啊，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历练和积累，才能从苦味里品尝到人生的真谛；也才会知道，苦后回甘，才是人生至为美好的境界。

2000年12月，婆母到新加坡小住。我出门时，看到全年皆有供应的泰国柚子，意兴勃勃地买了几个，要求婆母教我烹煮我朝思暮想的柚子皮焖肉。

婆母捧着柚子，转来转去仔细地看，然后，对我摇头说道：

“这些柚子，打过蜡、下过农药，柚子皮不适合用以烹饪。等你明年中秋节回来怡保，我再给你烹煮吧！”说着，又幽默地加了几句：“届时，我给你煮一大锅，让你放在冰格里，慢慢享用。”

婆母于2001年撒手尘寰，我们永永远远未能再共庆中秋节。

啊，“园林垂橘柚，门巷落楸梧。”

橘柚满树和落叶满地，都是人生必会面对的两种景致。

我把柚子皮焖肉的好滋味转化为舌尖上的记忆，深深地收藏在心灵的故乡里。

暖，曾经拥有，或许就是一种永恒的幸福了。

注释：

文冬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山地多、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种出来的柚子，果肉细致、水分充足，“文冬柚”因而成了“品质保证”的代名词。后来，这个品种的柚子也被引种到霹雳州的其他地区。在怡保石灰岩土壤里培育出来的文冬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家世背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祖籍广东揭阳霖磐镇东洲村的林遇逢跟随两位哥哥一同南来新加坡讨生活。

十多年后（1941年），年届29岁的遇逢娶小自己13岁的同村女子李美娥为妻。此时的大哥、二哥均已升级为人父。落地生根的兄弟三人在静山村（今宏茂桥一带）各自经营着自己的花圃。

大哥、二哥经营有方，遇逢的花圃则日渐荒芜，最后只得转行当起了清洁工。随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五男四女），遇逢一家的日子愈发捉襟见肘，但孩子们还是在母亲的唠叨声中一天天成长起来。

静山时光

1949年10月17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晚八时许，一阵婴孩的啼哭划破了静山的夜空——遇逢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再度为人父的遇逢为这个胖嘟嘟的男婴取名汉精。

汉精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除了家（他家和比邻的外祖父家）门前的三棵玉兰、两个池塘，还有屋后的一片树胶林。他常常在午后去树胶林里晃悠；莲花季节过后，他会涉水下池捉蜻蜓。池塘外是一条河，过了河是一片竹林，穿过竹林是一大片草甸——汉精的“疆域”自由而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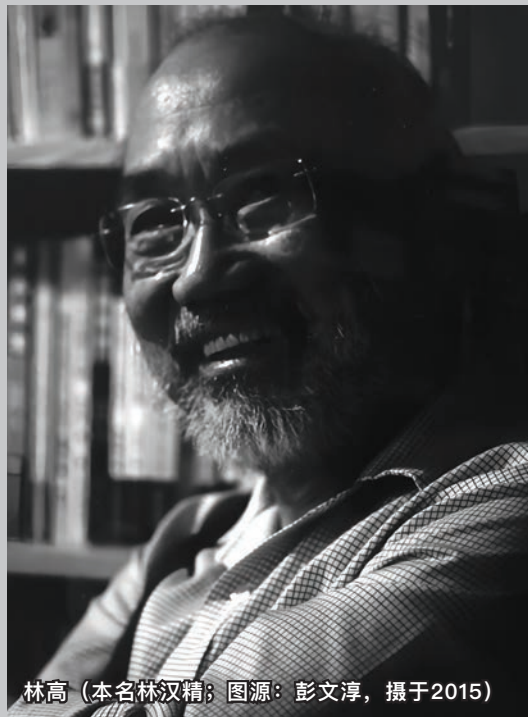
9岁那年（1958年），他走过村里的黄泥路，然后搭车前往三公里外的一所华校——光洋小学读书。读华校是父亲的决定，大哥和两个姐姐也都读的华校（姐姐读的夜校）。“不认识自己的文字就变成另一种人。”父亲如是断定。

高大稳重的汉精一入校便被班主任林玉贵老师推选为班长，但一天后即被撤职。原因是尚未学会讲华语的他在老师踏进课堂时头脑一片空白，无法喊出口令——要同学们“起立、行礼、坐下”。

被老师谑称“呆子”的他在当年年终考试时名列全班第八。接下来的五年里，除了四年级时屈居第三，其余年级他年年稳居第一。

发放成绩册的日子，他都会带奖品回来。“送阿四进英校就好了。”颇为惆怅的父亲屡屡感叹。“律己从严，待人从宽。”他用粉笔把这八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小黑板上给儿子看。

林高专访 住山中走去



林高（本名林汉精；图源：彭文淳，摄于2015）

那时的静山村有两座庙：七寨庙和红相公庙。前者每年庆祝神明诞辰时都会请戏班公演，七月（中元节）演潮州戏，正月演福建戏；后者每年请戏班公演一次潮州戏。跟着外公外婆和妈妈看酬神戏是汉精心灵成长的重要阶段。

1964年，小学毕业的汉精进入新扩建的光洋中学继续学业。

中一那年，教他语文的是来自台山的黄载灵老师。七十开外的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用沙哑低沉的粤语腔给学生讲解文言文占一定比例的《中华文选》（语文课本），虽没听懂多少，但汉精颇受感染。通过《中华文选》，他开始接触到鲁迅、朱自清、巴金等大家的作品，也对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及史学巨著《史记》等有了初步了解。

除了课堂学习，他还会借课外书回来读，也会读父亲买回来的华文报。

就读光洋中学的四年里，他年年考获全班第一。

中四那年，他代表学校参加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全国母语促进月作文比赛”，获第二名。

1967年，汉精考获华校中四会考二等证书。次年，他入读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德明政府中学前身）。

1969年，他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成绩符合大学入学标准，并于次年被南洋大学政行系录取。与此同时，他也接获教育学院“高中教育文凭班”的录取通知书。

汉精有一位家境富裕的童伴，名叫德华，也是他从光洋到德明的同学，他们常常一起温习功课。德华的父亲叶荣秋要他和德华一起去读大学，说缺的钱可以给他。但他还是选择入读教育学院，并到国防部缓役处申请缓役，得以先入学再服兵役。

接受教育学院两年（1970-1972）全日制师资训练课程后，汉精于1972年10月入伍，1975年4月完成国民服役。

服完兵役后，汉精跟母亲（父亲已病逝）一同搬至宏茂桥六道大牌208座十楼的一间三房式组屋里。

静山时光，成为他生命中的永远。

初涉文坛

教育学院时期，汉精开始逛书店，买书来读。

此时的他结识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辛白（黄兴中），喜欢舞文弄墨的辛白跟他不同班，但他们经常一起谈文学。

受辛白的影响，汉精开始以“林一飞”为笔名（一飞冲天，后来也就成了林高），投稿《南洋商报》“学府春秋”版。他投稿的散文《不！我要飞》被主编谢克转去“新年代”版刊出。“学府春秋”专为青年学生开设，“新年代”则主要发表成名作家的作品。处女作得以在“新年代”发表，于他而言是惊喜，也是鼓励。

此后的他不断有作品在《南洋商报》“学府春秋”版刊出。

1974年，在朋友的鼓励下，林高把发表于报刊的文章集结成书，是为他的首部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作者署名林一飞。

1975年4月，林高就职于德新中学，教中低年级华文和地理。那时的学校实行半天制，林高所教年级的课编排在下午，他跟知名诗人蔡欣（蔡向荣）共用一张办公桌。在蔡欣的引见下，林高结识了李向、林臻、梁三白、石君等成名作家。其时，写作并未纳入他的日程，偶有余力，他即投稿李向主编的“生活”及“青年文艺”版（《南洋商报》）。

1976年，林高娶小他三岁的陈慧湘（小学教师）为妻。



1975年，林高与未婚妻在静山村老家

1978年，经蔡欣推荐，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抛砖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设计蔡欣，作者署名林一飞。

负笈台湾

1981年，林高从朋友处得知政府颁发奖学金（PSC Scholarship）给应届毕业生赴台留学，亦鼓励在职教师前往深造。虽已超龄（上限三十岁），但他还是递交了申请表格，并在面试后被遴选委员会破格录取。

这年9月，他离开德新中学，赴台大中文系深造。

在那里，他遇到几位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老 师，如教《现代散文与习作》及《陶谢诗》的林文月老师、教《古典小说》的乐蘅军老师、教《诗选》的方瑜老师、教《古典文学赏析》的齐益寿老师、教《稼轩词》的吴宏一老师。毕业后，他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如今，只有齐益寿和吴宏一二位老师健在，其余三位已过世。

课余时间，他则潜心于孔孟及老庄之学。

此时的台湾文坛众声喧哗，名家辈出。文学视野洞开的林高，正于潮涌间寻索属于自己的航道。

1985年6月，学成归来的林高先后任职于莱佛士书院、教育部课程发展署、淡滨尼初级学院、莱佛士初级学院。2009年，他以签约的形式继续任教于莱佛士初级学院及裕廊初级学院，至2013年正式离开职场。

驰骋新华文坛

回到新加坡的林高再次提起了笔，除了散文，他也开始创作微型小说。自90年代始，除了本地报刊，他的作品也频频出现在台湾各大报副刊。

1987年，林高携妻回乡省亲。父亲的出生

地，父亲的童年，在他的笔下复活（父亲南来后不曾回去）。

1989年4月，林高调至教育部课程发展署，担任公民教育课程编写员，跟作家周黎、陈华淑、南子、苗芒、贺兰宁、洪生等成为同事。文友间时有茶叙，谈文论道自不在话下。

他跟周黎的缘分，可追溯至德新中学任教初期。其时的林高尚在试用期，转正需通过马来文考试（他已考过两次，都没能通过）。时任教育部视学官的周黎在听过他的课后，特别推荐他顺利转正，省却了再考马来文的烦恼。

1990年，林高在陈华淑的推荐下加入作家协会。

1991年，林高获“第五届金狮奖”散文组（推荐类）佳作奖，获奖作品《登高为领略美的历程》刊于《联合早报》副刊，推荐人周黎。后由马来西亚作家小黑推荐并转载于《蕉风》。

同年，他的首部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他近年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的作品。封面设计为后来（2001年）获颁文化奖的知名画家陈建坡，他们是光洋中学同届毕业生。

也就在这一年，他升级为人父。育儿经成为他笔下的风景。

1992年，林高当选作家协会理事，任学术组组长。

同年，他的第三部散文集《往山中走去》出版。“金狮奖”获奖作品收录其中，题目改为《往山中走去》。

1995年，林高入选黄孟文博士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卷》，其文集《林高文集》由鹭江出版社出版。

1997年12月，林高的第二部微型小说集《笼子里的心》出版。序文作者乐蘅军教授。

1998至2000年，林高被时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的王润华博士委任为第一副会长。之后他



林高部分作品

卸下理事职务，担任受邀理事至2022年。

2000年，林高的第四部散文集《被追逐的滋味》出版。序文作者林文月教授。

2003年，他的第三部微型小说集《数字拼合人生》出版。序文作者齐益寿教授。

2006年，林高接受《联合早报》编辑周星利之邀，在“文艺城”辟专栏“景点零售”，评析并推介发表于该版位之佳作，每月一评。约半年后，林仁余接任编辑，林高继续负责该专栏至2008年。

2009年11月，由陈孟哲筹划、林臻主编的《仙人掌散文系列》出版，其中的《林高卷》为林高的第五部散文集。

2012年，林高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出版。

2012年11月至2017年10月，林高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源》（双月刊）杂志主编谭瑞荣之邀，在该杂志辟专栏“文学景点”，赏析并推介微型小说和诗歌佳作。2018年起，他开始不定期撰写“人物景点”栏目，评介有特殊爱好和贡献的市井小民及文教界知名人士。

2013年，林高的第四部微型小说集《林高微型小说》（周黎作序）及首部儿童小说集《蜥蜴回家了吗？》出版。

同年，他的微型小说集《数字人生》由中国四川出版集团出版。《数字人生》跟2003年出版的《数字拼合人生》为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

这年八月，林高赴韩国原州市土地文化馆，参加由韩国小说家朴景利倡议创建的为期三个月的驻馆写作计划，期间完成散文《寻于Toji步履间》《先是半夜走山》及诗歌《霭霭Toji山峦》等作品。

2014年，林高获颁新加坡书籍理事会主办的“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也就在这一年，他为高中现代文学读本撰写的《品读》（与蔡欣合著）、《赏读》（与陈志锐合著）及为高中古典文学读本撰写的《赏读2》出版。



2015年，林高获颁国家文化艺术方面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

2015年，林高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最高荣誉之“新加坡文化奖”（华文文学）。

同年，《林高微型小说集》由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乃该微型小说集的第二个版本。

也就在这一年，林高开始撰写“英培安小说研究”。该写作计划获新加坡艺术理事会赞助，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松建受邀担任学术咨询。此后的林高用三年时间研读英培安的四部长篇、两部中篇和两部短篇小说（不包括2019年后出版的作品）并撰写评论。评论集《孤独瞭望：英培安小说世界》于2019年4月出版。

2017年，林高的第六部散文集《记得》及首部闪小说集《框起人间事》出版。

2018年至今，林高受邀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职高级讲师，教授《阅读与写作》。

《源》杂志特别拨出版位刊登学生的作品及林高撰写的评语，栏目名称为“仿佛风”。

2020年，林高为高中古典文学读本撰写的《细读与感知1》及为高中现代文学读本撰写的《细读与感知2》（与陈志锐合著）出版。

2021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制作了一个短视频系列节目，叫做《走进书房》共五集，访问五位狮城知名爱书人，林高是其中的一位。

2022年，《联合早报》“文艺城”推出新

栏目“开卷”，通过阅读、朗读加赏析的形式让读者感受和了解新华文学。以诗为主，每周一首。林高为受邀撰写赏析者之一。

同年4月29日，林高受邀在草根书室推出的“瓦罐煮诗”节目里与上海诗人王寅作了一次线上对谈。节目策划兼主持人为陈志锐。

林高还曾担任多届肯特岗文学奖、方修文学奖、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比赛、南洋文学奖、新华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金笔奖等本地文学奖项的评审，并在颁奖礼上点评获奖作品。

自2011年至今，林高20余次受邀在各种文学活动中担任主讲。

编辑文学书刊

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及副会长期间，林高积极参与文学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

1990年6月至1991年12月，他担任作家协会《文学》（半年刊）编委（25至28期）。时任执行编辑为贺兰宁和寒川。

1992年年初，林高和张挥、周粲、林锦创办了《微型小说季刊》（发起人张挥后来因故退出，董农政加入）。1992年4月至1996年4月出版16期，周粲主编；1996年7月至1997年10月出版6期，董农政主编。林高始终为编委。该季刊由作家协会出版，投稿者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地。

1993年，林高受时任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博士委托，召集年轻作者梁文福、非心（李慧玲）、柯思仁、蔡深江、韦铜雀（吴耀宗）、黄凯德等创办一份文学杂志（受邀者邓宝翠和沈鹰没有参与创刊讨论与编务），旨在支持青年作家按自己的理念出版刊物，借此搭起他们和新加坡作家协会之间互动的桥梁。经讨论后刊名敲定为《后

来》（四月刊），创刊号于1994年6月由作家协会出版，次年11月停刊。“桥梁”没能搭建起来，《后来》没有了后来。

1997年6月至1999年1月，林高主编的三期儿童文学半年刊《萤火虫》和《百灵鸟》由作家协会出版。

2005年，林高主编了《新加坡微型小精品》，30位作家的56篇作品入选。

2021年，林高受邀主编《联合早报》“文艺城”文选——《文字现象2021》，并撰写序文。

2021年10月10日，诗坛前辈林方在还未来得及整理出版自己零散的诗稿便猝然离世。10月底，林高和陈志锐前往林家，对遗稿进行系统梳理，连同他已出版的两册诗集《水穷处看云》《林方短诗选》及已发表但未集结出版的诗作，汇总整理为四部分内容，辑成《林方诗全集》。该书于2022年11月正式出版。

诗心未老

2013年，离开职场的林高开始专注于写诗。

“蹉跎了很多年的红颜知己”蓦然眼前——“所有的绿说好都开花，树浅浅就笑了。”

2023年，林高的首部诗集《一只飞行的水晶》出版。

2025年，林高的第二部诗集《白色穿越》出版。

迂回的语言，朦胧的曲折，意象的寓托——沉积于胸襟的话，就这么说。

“知音存在于人世间。”

夕阳余晖下，七旬林高缓缓转身，走向独属自己的山林。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认识林高该有十年之久了，大胡子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十年如一日的他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我，每次见面都那么暖暖地笑着。

“文化奖得主噢！”另一半总这么提醒，生怕我有眼不识泰山。但我其实一直在仰视，睁大眼仰视，不敢多说一个字。

他的文我是喜欢的，无论哪种文体。一读再读之下，颇有点儿懂的意思。

“《我的幸与不幸》读得我泪眼婆娑……”采访过后的信息交流中，吐露心声的仅此一条。

不必多说，一个字也不必。

舞步未止 探索不息

吴慧英的舞蹈旅程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隔

着屏幕与吴慧英展开访谈时，远在英国求学的她，语气开朗爽快，谈吐自然大方。从最初通过电邮联系开始，她便给予人一种真诚而随和的感觉，没有距离感，也没有舞台上舞者常予人的冷峻印象。谈起舞蹈时，她时而认真思索，时而流露兴奋与投入，言谈之间展现出对艺术的热忱与坚定。如今已站上更广阔国际舞台的她，依然保有一份自然、谦逊与纯粹，对舞蹈的热爱，也仿佛从未改变。

从芭蕾到华族舞：梦想的起点

现年25岁的吴慧英原籍印度尼西亚，自小便展现出对音乐与动作的敏锐感受。小时候的她精力旺盛，只要音乐一响起，便会随着节奏蹦蹦跳跳，自由摆动身体。母亲看在眼里，便在她年幼时为她报名芭蕾舞课程，希望她有机会通过舞蹈释放活力。事实上，吴慧英的母亲本身也喜爱舞蹈与艺术，只是年少时未曾真正有机会学习，因此更希望女儿能够接触舞蹈，在成长过程中找到真正热爱并愿意坚持的事情。

六岁那年，吴慧英随家人移居新加坡，并继续学习芭蕾舞。进入小学后，就读于CHIJ Our Lady of the Nativity的吴慧英，在母亲鼓励下选择华族舞作为课外活动。由于母亲一直对中华文化深感兴趣，也十分喜爱华族文化艺术，因此希望女儿能够进一步了解与接触这一领域。未曾想到，这一次的选择，竟成为吴慧英舞蹈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华族舞便一直伴随着她的求学岁月，也逐渐成为她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小学毕业后，吴慧英凭借华族舞申请DSA (Direct School Admission, 直接招生计划) 进入新民中学。进入中学后，她坚持练习从小学习的芭蕾舞，每逢周末都会继续训练。然而，学校华族舞团频繁的排练与演出，却逐渐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并成为她的生活重心。长时间沉浸于华族舞的学习与团队生活之中，也让她对这一舞种产生越来越深的认同与依恋。相较于芭蕾舞讲究精准与规范的技巧训练，华族舞更让她感受到肢体表达上的自由，以及情感上的投入与归属感。

中学时期的吴慧英，早已将大量时间投入在



舞蹈之中。对许多同龄学生而言，升学道路往往离不开初级学院、理工学院等较为传统的选择。然而，对她来说，舞蹈却早已不仅仅是一项课外活动，而是自己真正想认真走下去的方向。因此，中学毕业后，她选择报读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简称“南艺”）舞蹈系文凭课程，希望进一步接受专业训练。

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算主流。新加坡虽然已逐渐开始重视艺术发展，但选择艺术道路的人仍不算多，尤其是将舞蹈视为未来职业方向，更让不少同学感到意外。吴慧英回忆，当身边同学得知她决定进入南艺时，不少人都露出惊讶的反应，甚至会问她：“你真的要读舞蹈吗？”“以后会不会很难发展？”

尽管外界有所疑惑，母亲的支持却始终给予她很大的力量。当吴慧英向母亲说出自己想报读南艺的想法时，母亲并没有迟疑，反而十分支持她的决定。“既然你喜欢，那你就去试。”一句简单的话，却让她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对吴慧英而言，母亲一路以来的支持，不只是允许她学习舞蹈，更是一种无声的信任，让她能够安心地朝自己真正热爱的道路前进。

当热爱成为人生方向

进入南艺后，吴慧英也正式接触到当代舞的世界。由于学院课程以当代舞训练为主，她逐渐从过去熟悉的华族舞与芭蕾舞体系，迈向更广阔、多元的舞蹈语言世界。回忆起当时的学习生活，她形容那是一段节奏紧凑却极为充实的日子。几乎每周五天，她都沉浸在密集训练之中。除了当代舞与芭蕾舞之外，课程也涵盖多种亚洲舞蹈，包括马来舞、印度舞、韩国舞及泰国舞等。

面对截然不同的舞蹈体系与身体语汇，吴慧英并没有刻意抗拒或强行统一风格，而是尝试以每一种舞蹈本身应有的方式去理解与接近它们。她坦言，自己似乎很自然地便能在不同舞种之间转换状态，也逐渐学会如何尊重每一种舞蹈背后独特的文化气质与表达方式。这样的训练经历，不仅拓宽了她对舞蹈的理解，也让她开始重新思考“舞者”真正的意义。

在南艺求学期间，她也遇见了不少深深影响自己的导师。其中一位便是曾于2010年代担任新加坡芭蕾舞团（Singapore Ballet）职业舞

者的Toru Okada。吴慧英至今仍清楚记得，对方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一句话：“不要只想看技巧，而要用你的艺术性去帮助你的技巧。”

当时年仅十七、十八岁的她，仍处于不断追求“做对动作”的阶段，总是反复要求自己必须准确、整齐、规范地完成每一个动作。然而，导师的这番话，却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舞蹈并不只是身体动作的完成而已。舞者不仅是在“跳动作”，更需要真正进入角色，理解作品中的情感、人物与状态，并通过身体把这些内容传达给观众。

这番话后来也逐渐成为她思考舞蹈的重要转折。比起单纯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她开始更关注舞蹈中的表达、情感与人物塑造，也更认真地思考，自己究竟想成为一名怎样的舞者。

随着舞蹈视野不断拓展，吴慧英在南艺期间的表现也逐渐获得肯定。她先后获得院长荣誉奖（Dean's List Award，2019年及2021年）、陈济民奖学金（2019年），以及陈振传基金会优异奖（2020年），展现出扎实的舞蹈基础与优异的学习表现。除了课堂训练之外，她也积极参与与校内外演出与创作项目，并有机会与多位本地及海外编舞家合作，包括林美琴、Donn Neo及Aditep Buanoi等。不同文化背景与创作理念的碰撞，不仅让她接触到更多元的舞蹈语言，也不断拓宽她对舞蹈艺术的视野。回顾那段求学岁月，她认为，无论是获得的荣誉，还是与不同艺术工作者交流合作的经历，都成为她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养分，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临近毕业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悄然出现。当时，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林美琴受邀到南艺教授华族舞与亚洲舞蹈课程。课程接近尾声时，林美琴主动询问吴慧英和同班同学黄文汝，是否有兴趣参加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试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吴慧英坦言自己既惊讶又兴奋。能够获得专业舞团的关注，对当时仍是学生的她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经过试镜，吴慧英顺利获得加入舞团的机会。2021年6月，她以见习舞者的身份加入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从学生身份迈向职业舞者的新阶段。

在舞团里成长

初入舞团的日子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当时正值冠病疫情期间，许多演出计划受到影响，公开演出的机会相对有限。对吴慧英而



2022年“华艺节”，参演《如果是现在》



2024年在滨海艺术中心新电信水滨剧院，参演《川之生命河》



2023年在大树脚，参演《梁祝片段》

言，比起演出减少，更大的挑战其实来自身份上的转变。以往在学校里，学习的方向和目标往往都有老师带领，但进入专业舞团后，她必须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总有人不断给你新的资讯和学习内容，但成为职业舞者之后，我必须自己去掌握学习的节奏，也必须有足够的自律去维持身体状态。”

对于长期习惯学校规律生活的她而言，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刚加入舞团的头几个月，她一度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也正是在这段摸索与适应的过程中，她愈发确定自己选择的道路。加入舞团短短数个月，她便清楚知道，这将是自己愿意投入一生的事业。

由于过去并没有接受过完整而系统化的华族舞训练，进入专业舞团后，她发现自己对这门艺术的认识其实才刚刚开始。从动作术语到训练体系，许多内容都需要重新梳理与学习。过去的她虽然长期接触华族舞，也熟悉其基本风格与形态，但进入专业舞团后，才真正理解专业训练所要求的深度与严谨。“好像知道华族舞是什么样子，但又好像要从头开始学习。”她笑言。

这样的经历也让她明白，无论过去获得过多少肯定，进入新的环境后，始终都需要保持谦逊的心态。与此同时，舞团生活也让她逐渐建立起职业舞者应有的工作态度与职业素养，学会如何与观众、合作伙伴及社会大众互动，并在开放学习的同时，坚守自己的专业价值与原则。

从站在台上到创造作品

在逐渐适应专业舞者的生活后，吴慧英也迎来了更广阔的舞台。加入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以来，她曾参与华艺节、第19届釜山国际舞蹈节等演出，并先后参演《如果是现在》《川之生命河》《心绪流动》及《梁祝片段》等作品。不同风格与形式的演出经历，不仅让她不断累积舞台经验，也拓展了她对舞蹈艺术的理解。

在众多作品之中，2023年的《花语》至今仍是她印象最深刻的演出之一。《花语》由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三位编创者共同呈现，而吴慧英参与的是艺术总监梁杰旒编导的《瓶花·独特的配搭》。

过去的她，大多参与群舞演出，习惯在团队之中与舞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作品。然而，《花语》却将她推向舞台中央，让她首次以独舞者的身份承担更重要的表演任务。对于一向习惯融入群体的她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以往站在群体之中，总会有其他舞者与自己一同分担压力，但当聚光灯落在自己身上时，肩负的不仅是个人的表现，更是整部作品所承载的情感与张力。这样的经历促使我走出舒适圈，也让我逐渐建立起面对舞台的自信。”

回顾这段经历，吴慧英认为《花语》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她的一次重要蜕变。从习惯融入群体，到学会独自站在舞台中央，《花语》成为她舞蹈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也让她看见自己



2024年“一起舞FUN天”，
参演《欢庆·酒歌》



2024年“薪动时刻”，参演《月影流年》



2023年，参演《花语》之《瓶花·独特的配搭》

更多的可能性。

除了在表演上不断突破自己之外，吴慧英也逐渐开始接触舞蹈创作。早在2022年，她便参与了舞蹈剧场《薪动时刻》的编创工作，以作品《吃》探讨棋局博弈带给人们的兴奋与悬念，并尝试将中国象棋攻防之间的张力转化为舞台上的肢体语言。这不仅是一次创作上的尝试，也让她开始从创作者的角度思考舞蹈作品的构成与表达。

经过几年舞台实践的积累后，吴慧英于2025年迎来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项重要突破。8月，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推出多感官舞蹈剧场《印象·直落亚逸》，由艺术总监梁杰旒构思、联合创意总监苏健龙执导，并邀请两位全职舞者——黄文汶与吴慧英——首次担纲编舞。

吴慧英编导的作品《信·念》，讲述一名文盲女工通过书信寄托思乡之情的故事，以细腻的情感刻画人物内心的牵挂与坚守。对于吴慧英而言，《信·念》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她首次以编舞身份独立呈现创作成果的重要里程碑。通过这部作品，她将自己的艺术想法首次转化为舞台呈现。

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多年来，无论是作为舞者还是编舞者，吴慧英始终没有停止探索舞蹈的更多可能性。从芭蕾舞到华族舞，从当代舞到亚洲各民族舞蹈，她始终在不同舞蹈语言之间寻找新的连接与可

能。而这样的探索精神，也引领她迈向人生新的阶段。

2025年8月，吴慧英荣获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奖学金，前往英国圣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Trinity Laban Conservatoire of Music and Dance）深造当代舞。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意味着迈向更广阔艺术世界的新起点。

近年来，她对传统华族舞与当代舞之间的融合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进一步探索两者之间结合的可能性，寻找属于自己的舞蹈语言。她相信，传统与当代并非彼此对立，而是能够在交流与碰撞中激发新的创作可能。赴英深造，正是希望通过接触不同文化背景与艺术环境，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与创作思维。

谈及未来，吴慧英希望能够将海外所学带回新加坡，与社区分享，让更多人感受到不同文化艺术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魅力。“通过艺术创作，我希望把新加坡独特的舞蹈视角推向国际，同时促进社区的互动交流。”

从小时候听见音乐便忍不住随着节奏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到今天远赴英国追寻更广阔艺术天地的青年舞蹈工作者，吴慧英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舞蹈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一种理解世界、连接文化、传递情感的方式。属于她的舞蹈旅程，显然仍在继续。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弦歌不辍 乐韵长流

两位华乐人巫振加与郑重贤的艺术人生



文·郭永秀

图·受访者提供

2025年12月31日，新加坡华乐团四位资深演奏家在服务乐团数十载后荣休，为各自的职业演奏生涯画上圆满句点。除了本刊上期专访的两位笛子演奏家林信有和彭天祥外，还有次中音唢呐演奏家巫振加和二胡演奏家郑重贤。

巫振加和郑重贤，一个醉心吹管乐，一个深耕胡琴艺术；一个开拓了次中音唢呐在新加坡华乐的发展，一个推动了胡琴重奏在本地的创新与传播。他们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却有着相同的信念——把一生奉献给华乐。

他们的人生，几乎就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缩影。

巫振加的吹管人生

巫振加与华乐的缘分，始于一支别人丢弃的旧笛。他出生于1959年，父亲在戏班里拉椰胡，自幼耳濡目染。小时候，邻居一位哥哥玩笛子，其中一支笛子裂开后被丢弃。巫振加从垃圾堆里拾回这支裂开的笛子，用胶布把它的裂口粘紧，便开始自己摸索吹奏。就是这样一支破旧的笛子，开启了他一生的音乐旅程。

进入大智中学后，他先后跟随潘耀田、陈勤南博士学习笛子。中三时，经许金花介绍加入人民协华乐团玩打击乐。他还记得当时的指挥吴大江执棒自己创作的《椰林舞曲》时，他负责敲击椰壳制作的打击乐器，还一连打破了几个椰壳。

1974年至1976年，是巫振加音乐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当时，我担任新加坡红十字会华乐团指挥，巫振加是团里的笛子手。红十字会华乐团在我接任之前，只是一个10多人的华乐小组，鲜少有人留意。我接任后着手发展乐团，短短两年间，乐团不断接获演出邀请，包括当时由新加坡广播电台每两个月举办一次的电台音乐会，我们便曾受邀演出多次。



巫振加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邀请函陆续寄到红十字会总部，管理层这才发现属下竟然有这样一个华乐团。一些理事提出疑问：红十字会是否需要这样的乐团？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不需要”。于是，一个发展势头正盛的乐团，就这样被迫解散。

红十字会华乐团解散后，应国家剧场俱乐部主席刘旭文邀请，我成立了国家剧场俱乐部华乐团，并继续担任指挥。巫振加还是团里的笛子手。我曾多次安排他担任独奏，记得他还演奏过我创作的笛子独奏曲《乡村之歌》。

那时候，我已经看见他身上的潜力。他练习认真，学习能力强，对吹管乐器始终保持浓厚兴趣。有一次，我在一家乐器店里看到一把被灰尘蒙蔽、从未有人问津的次中音唢呐。我十分感兴趣，便向店主严孔耀询问。他告诉我，这件乐器已经摆在那里很久，如果我要，只需一百多元便可带走。我如获至宝，把它买回家慢慢研究。

研究之后，我发现它的指法与西洋单簧管十分相似，推测应该是参考单簧管而设计出来的新型吹管乐器。由于大家对它十分陌生，因此一直无人问津。熟悉指法后，我渐渐发觉，这件乐器音色浑厚，正好能够弥补当时华乐团吹管声部中低音不足的问题。

于是，我问巫振加有没有兴趣学习，他表示有兴趣。我把基本指法、吹奏技巧和运气方法教给他，他便把乐器带回家反复练习。从此，他便与次中音唢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中四毕业后，巫振加入伍服役两年，随后继续签约两年，直到1980年才离开军队。同年，他正式加入人民协会华乐团。

进入人民协会华乐团后，时任指挥顾立民发现巫振加演奏次中音唢呐后，非常欣赏，并首次把这种当时几乎无人会吹的乐器运用到乐队中。从此，巫振加开始担任次中音唢呐演奏员。

后来，人民协会华乐团改组成为新加坡华乐团。1983年，巫振加正式成为专业团员，也是新加坡第一位次中音唢呐演奏员。虽然次中音唢呐是他的代表乐器，但他在笛子演奏方面同样成绩斐然。1981年，他荣获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举办的全国华乐比赛笛子公开组冠军；1982年再度蝉联冠军，并经常受邀到电台录制《扬鞭催马》

《春到湘江》等笛子名曲。

然而，在巫振加眼中，学习从来没有终点。

为了不断提升演奏水平，他四处拜师求艺。1987年他赴中国向笛子大师陆春龄学习江南丝竹；1988年他住在赵松庭老师家中三个月，专心学习笛艺。此外，他还曾向简广易、宁宝生、曾永清学习，并向上海音乐学院夏飞云教授及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瞿春泉学习指挥；1994年至1995年间，又进入南洋艺术学院修读指挥课程，不断充实自己。

同样是在1987年，著名笛子演奏家董秋明来新加坡演出，把自己演奏的一支葫芦丝赠送给巫振加，并向他介绍基本吹奏方法。从此，他开始钻研葫芦丝，并多次登台独奏。同年，他受邀前往泰国参加泰皇50岁寿辰庆典，在泰南演奏《傣寨情歌》。

除了笛子、次中音唢呐和葫芦丝，他还精通洞箫、巴乌、唢呐、管子、倍低管等多种吹管乐器，同时钻研各种吹管乐器的维修技术，在吹管乐领域涉猎极广。

作为专业演奏员，巫振加不仅活跃于舞台，也长期投身华乐教育。他先后任教于杨厝港小学、欧南园中学、海星中学、义安理工学院、圣安东尼中学等学校，指导的学校华乐团多次在教育部青年节华乐比赛中荣获金奖。他曾担任圣安东尼中学华乐团指挥12年；担任尚义中学华乐团指挥33年，带领乐团在青年节比赛中获10金3银。新加坡华乐团的笛子演奏家徐小鹏、中阮演奏家饶思铭等，都曾是尚义中学华乐团成员。此外，他也曾担任大巴窑文德联络所、尚育



巫振加的儿子巫崇玮2016年硕士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夫妇二人与儿子合影

联络所及福州会馆华乐团指挥。

在新加坡华乐团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中阮演奏家吴美凤，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巫崇玮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华乐系，后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取得打击乐硕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华乐团打击组首席。一家三口先后在新加坡华乐团任职，成为本地乐坛一段佳话。

1991年，我担任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组主任时，特别策划了一场笛子与二胡演奏会，邀请巫振加和新加坡华乐团二胡演奏家翁凤梅担任独奏，全场座无虚席，也让我再次见证了他日趋成熟的舞台魅力。

退休之后，巫振加依然没有离开音乐。

虽然卸下了专业演奏员的身份，但他每天仍坚持练习笛子、洞箫、唢呐、次中音唢呐、葫芦丝、巴乌等各种吹管乐器，还经常把练习和演奏的视频发给我。从这些点点滴滴，不难看出，他对吹管乐器的热爱完全发自内心，从未把音乐仅仅视为一份职业。

2020年，他应邀加入我担任音乐总监兼指挥的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担任管乐组指导员。2024年和2025年的乐团常年音乐会上，他两度表演葫芦丝独奏，以细腻动人的演奏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从少年时代捡起一支裂开的旧笛，到成为新加坡首位专业次中音唢呐演奏员；从舞台上的演奏家，到教育岗位上的园丁，再到退休后依然每天练习、坚持传承华乐的乐人，巫振加始终没有离开过华乐。

郑重贤的胡琴人生

与巫振加因一支破笛走进华乐不同，郑重贤与华乐的缘分，始于电视机前的一次偶然。

郑重贤1962年出生。小时候，他在家中看电视，荧幕上一支乐队正在演奏《喜洋洋》，深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万慈小学读四年级时，老师林亚历在校内成立华乐团，并亲自担任指导老师。由于个子较高，他被安排演奏低音乐器。当时华乐团尚未采用西洋大提琴和倍大提琴，因此他拉奏的是形似放大版二胡的大胡。虽然这并非他后来专攻的乐器，却让他初次体会到乐队合奏的乐趣，为日后学习胡琴奠定了基础。

升上务立中学后，他正式学习二胡，在指导老师伍老师及二胡演奏家周经豪的指导下不断进步。1978年，经杨票敬老师推荐，他加入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指挥是李雪岭）。翌年，又代表新加坡参加香港主办的亚洲音乐营（指挥是汤良德）。1980年，郑重贤加入甘榜菜市华乐团，当时由何万良担任指挥。在青年华乐团及甘榜菜市华乐团期间，他经常担任领奏、独奏及协奏。

1982年底，他入伍参加国民服役，直至1985年6月完成兵役。退伍后，他继续留在新加坡青年华乐团和甘榜菜市联络所华乐团。当时乐团指挥已由吴国文接任，其后再由郑重贤接棒；在此期间，他也担任静山联络所华乐团指挥。同年，他报考加入人民协会华乐团，成为兼职团员，正式迈向专业演奏之路。

1987年，是郑重贤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他参加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办的全国华乐比赛，一举夺得二胡公开组冠军，并得到比赛评审、著名二胡演奏家刘明源的悉心指导。比赛所得的一千元奖金，加上申请到一个月无薪假，让他得以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向项祖英学习二胡，并利用课余时间向闵惠芬老师学习。他也曾参加由南洋艺术学院主办、由胡琴演奏家王国潼指导的考级大课课程，并在瞿春泉旅居新加坡期间向他学习指挥。

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正式成立，郑重贤成为全职二胡演奏员，自此展开数十年的专业演奏生涯，直至退休。在新加坡华乐团任职期间，除了担任二胡演奏外，他也积极推动胡琴艺术的发展。



郑重贤在多所学校指挥华乐团，培养了无数年轻乐手

展。1999年，他与郑景文（后改名郑璟绅）、潘语录及林傅强共同成立新加坡首个“胡琴四重奏”（Huqin Quartet）。这个本地唯一的胡琴组合获得何志光教授、潘耀田等前辈的高度赞赏，经常为这个胡琴四重奏编曲和创作新曲。

“胡琴四重奏”活跃乐坛十余年，经常受邀代表新加坡赴世界各地参加国际艺术节，并举办专场演出，广获赞誉。演出足迹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至墨西哥、澳洲及新西兰。2004年，“胡琴四重奏”荣获“新加坡青年奖”（Singapore Youth Award），其艺术成就备受肯定。

郑重贤随“胡琴四重奏”、新加坡青年华乐团及新加坡华乐团到国外演出，足迹遍及马来西亚、英国、纽西兰、澳洲、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夏威夷、加拿大、汶莱、墨西哥等地，每场演出都深获当地观众的喜爱及好评。

除了演奏，郑重贤同样重视教育工作。多年来，他先后在Charlton Primary School、勿洛小学、东景中学、圣婴中学、蔡厝港中学、淡马锡中学、淡马锡理工学院、美廉初级学院、瑞士村中学等学校指导华乐团，培养无数年轻乐手。2001年，他因指导乐团成绩卓著，获淡马锡理工学院颁发“最佳指导员（文化艺术领域）奖”。

为了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郑重贤不断进修，并于2008年考获英国伦敦音乐学院研究生指挥文凭，同年受委为英国伦敦音乐学院华族音乐演艺考级评鉴师，继续推动本地华乐教育的发展。

退休后的郑重贤，仍然对华乐保持着高度的兴趣。2026年，他应邀加入我担任音乐总监兼指挥的醉花林银河民族乐团，担任弦乐组指导员。同年，他还受聘担任麻坡凯歌歌乐协会华乐团艺术顾问。他再次投身乐团工作，把多年累积的舞台经验和教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退休，不退场

巫振加与郑重贤的成长背景、演奏乐器和艺术道路虽然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坚持——对华乐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以及对薪火相传的责任。他们这一代华乐人，见证了新加坡华乐从业余走向专业，也亲身参与了新加坡华乐团的发展与成长。他们不仅是舞台上的演奏者，也是教育工作者、创作者、指挥和推广者，为本地华乐的发展默默耕耘数十载。

退休之后，他们依然没有离开音乐，而是继续活跃于乐团和校园，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代。对于真正热爱音乐的人而言，退休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而不是艺术生命的终点。乐声未歇，弦歌依旧。巫振加与郑重贤的人生仍在继续，而他们数十年来为新加坡华乐所谱写的篇章，也将随着一代又一代华乐人的接续传承，继续回响。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郑重贤（图源：新加坡华乐团）



淡墨鱼乐见心性 篆刻练达有文章 艺术家陈振文印象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恬淡一生，持定力大器晚成

陈振文（Tan Chin Boon, 1953-）给人的印象是好好先生，温润如玉。他总是以谦逊的微笑面对所有人，更多时候是默不作声，任凭你高谈阔论或手舞足蹈，他只是静静聆听，轻松旁观。在一派喧嚣热闹的本地艺术圈，尤其是稍显浮躁和俗气的水墨画家群落里，他更像一位得道多年、洞若观火的智者，看破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争先恐后，在滚滚红尘中静心修行，

既不因清高而厌恶，也不因孤寂而绝尘——他的前世也许是古代先哲庄子所说的那条早已相忘于江湖的鱼。在位于后港一带的家里，陈振文养着数缸并非名种的普通小鱼，他说这些鱼儿就是他童年时在乡村池塘里嬉戏的小鱼，曾经陪伴他度过无与伦比的快乐时光。他把客厅与阳台之间的隔断打开，让宽大的阳台直接成为客厅的延伸，端坐屋中，即可最大限度地迎接阳光、风雨和暖风。那里摆放着硕大的绿色植物，以及点缀着精

美纹饰、古色古香的陶瓷大缸，缸里就是成群的小鱼，忽紧忽慢地游弋，自由、自在，丝毫不管所处的是否是一个有限的人造空间，也不管外边是否还有更大、更广阔的美好世界。

陈振文是一位从事绘画与篆刻的艺术家。艺术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当解决了温饱与安全后，人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更高的审美需求。在西方文明体系里，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后，人类对于美这种基于共感受的必然愉悦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理性判断。

对人来说，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存在着以思想为名义的理智与哲学，以及超乎思想之外的，不可控制与琢磨的未知。陈振文家中的鱼和鱼缸，像极了他以艺术家的冷静目光时时刻刻观察着的我们的世界。很多时候，人总是希望追求更多，甚至妄想一些根本不切实际的东西。以探索未知的名义燃起雄心，这固然有难得的勇气，可钦可佩，但坦然接受既定的现实，在有限的平凡中活出精彩，同样不失为智慧的决定。近三百年来，西方人在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发展成就的鼓舞下，以强烈的探索和扩张欲望，踏足人类未曾生活过的角落和领域，带来新的文明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平衡。迄今为止，西方文化和社会体系以发现、探索和进取的名义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实质性伤害，仍在一些缺乏反思的人的推动下持续发生。而古老的东方有着与之不同的哲学与认知体系，两千年来恒久不绝，信奉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以无为而治，物我两忘为最高精神境界，这也许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智慧。

是上帝之手早早点醒了陈振文，让他对人生与艺术有了如此的认知与决定。他出生于新加坡，是第二代南来华人，祖籍中国福建南安。1970年，陈振文入南洋美专（NAFA）西洋画系，副修中国画，但偏偏是副修的课程成就了他一生的志趣与成就——这大概就是藕断丝连、不能割舍的华人血脉关系吧。彼时施香沱教花鸟，陈宗瑞教山水，画马来渔村。陈振文从事艺术数十载，一直是若即若离的状态，悠哉游哉。要不是女儿一时的大胆怂恿和鼓励，他也不会参加UOB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他以最为熟悉的小鱼为主题，画一团首尾相接、自得其乐的小鱼——湿地花草、甘榜池塘——鱼乐，是陈振文的恒久心结与主题。全靠女儿一手操办，

报名、填表格，送交作品，到最终接到通知获得2024年度新加坡资深画家组金奖，他都是以淡然、坦然的心态迎接。于古稀之年第一次参赛，只投稿一幅作品就获得大奖，这一切似乎有些意外，却又好像在情理之中。

绘画之外，陈振文的艺术追求是篆刻。中国画历来讲究书画同源，一般认为，书法无力而孱弱者是画不好画的，而篆刻是书法的金石化身与再现。五十多年来，他精湛的篆刻艺术广受推崇，先后出版了三本篆刻专著：《陈振文篆刻I》（2012）、《陈振文篆刻II》（2014）及《陈振文篆刻III》（2018）。他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啸涛篆刻书画会的会员，啸涛成立于1971年，创会时他没有加入，创建时有他的师兄与学长陈建坡、许梦丰、李福茂、曾纪策等10人，他是1980年前后才参加的，彼时他自己经营一间工艺品商店。

年幼时，陈振文住在勿洛蓄水池一带，附近多溪水杂草，童年最快乐的事就是在沟渠和水塘里抓鱼。周围野花野草很多，乡村的孩童赤脚乱跑，每天都是快乐的时光。他的家境一般，小学读勿洛的平仪小学，但他不太喜欢读书，贪玩，成绩一般，英文也不好，到现在英语也是讲得马马虎虎。不过陈振文很喜欢上美术课，用有

《湿地晨曲》纸上彩墨 96X90cm (2023)



颜色的铅笔和蜡笔画画，受到老师表扬，这极大地建立起他对绘画的兴趣。上中学时虽然美术课没有专业老师授课，他仍然继续尝试学画水彩、素描，也学刻印，去五金店买一把刀，买些便宜的杂石试着创作。陈振文的父亲虽不反对他的兴趣与专业，却认为没有前途，但陈振文仍继续坚持刻印。1972年，他自南洋美专毕业，然后服役，1975年结束后在巴刹帮父亲杀鸡，当小贩4年，过后到联络所教授儿童美术，业余时间自己画画。

在南洋美专读书期间，他常把刻好的印章拿给施香沱看。当时，陈建坡是三年级，比他年长，但两人有相同的爱好，经常一起切磋。陈振文也很爱去二手书店，曾买来一本齐白石的《三百印石谱》。世人一般只知道齐白石画画有名，但在中国艺术圈，其最先是以其高超的篆刻功夫引起收藏界、评论界与学术界的认可的。当年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史学者和艺术评论家之一陈师曾，正是无意中看到齐白石的篆刻印章，才辗转找到寄居在京城法华寺的齐白石，主动拜访，并把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带到日本，成就了齐白石一生的艺术名望与地位。齐白石以单刀入石，身手潇洒，布局、刀法漂亮，陈振文非常喜欢，对他的篆刻影响很大，但他并没有刻意模仿，知道齐白石那句名言：似我者死。他也曾买来中国篆刻名家邓散木的印谱学习，当时惊为天人，现在看则觉得太甜，有些公式化。有时候陈振文也到中华书局看其他人的印谱，从中领略到边款与印文的呼应关系，体会一方印就是一则故事。

对一般人来说，印文用字古涩难懂，陈振文生性随和，不喜欢遥不可及的深奥词句，于是决定在石头上刻生活里的平常句子，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拓宽书写内容，而且绝不重复。大多数情况下，他对构思边款的思考时间更长，也更重视边款的内容，认为有发挥和想象的空间，更有意义。他的篆刻题材颇为丰富，基于现实生活，比如新加坡本地流行的咖啡俗语，如“Kopi-O Kosong”（不加奶、不加糖的纯黑咖啡），“Kosong”（空/零/不加糖），“Tak Boleh Tahan”（受不了/不能忍/撑不住），表现出对南洋本地语言混杂现象的特殊驾驭与文人情趣，也有“Thousands of Miles of Yunshan”（云山万里）这样文雅的词句，有时也把对时事的看法与牢骚刻在石头上印出来。

西画切入，以湿地景观创新南洋风格

提及中国画，年代最早、最重要的学术论著当首推南朝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日后另有唐代张彦远写《历代名画记》。这些论述不仅记录了现在已不可再见的很多唐代以前的绘画杰作，也是古代中国关于水墨画创作技法和理论认识的最具权威性的说明。一千多年来，这些艺术思想，深植于中国艺术家的内心，也不可避免地以良性文化输出的方式，在历史上影响了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又通过丝绸之路，波及中亚及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和地区，甚至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体系的时候，再次假借日本艺术的通道，如浮世绘，间接影响了欧洲和世界的艺术发展方向。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提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迹简意澹而雅正”^[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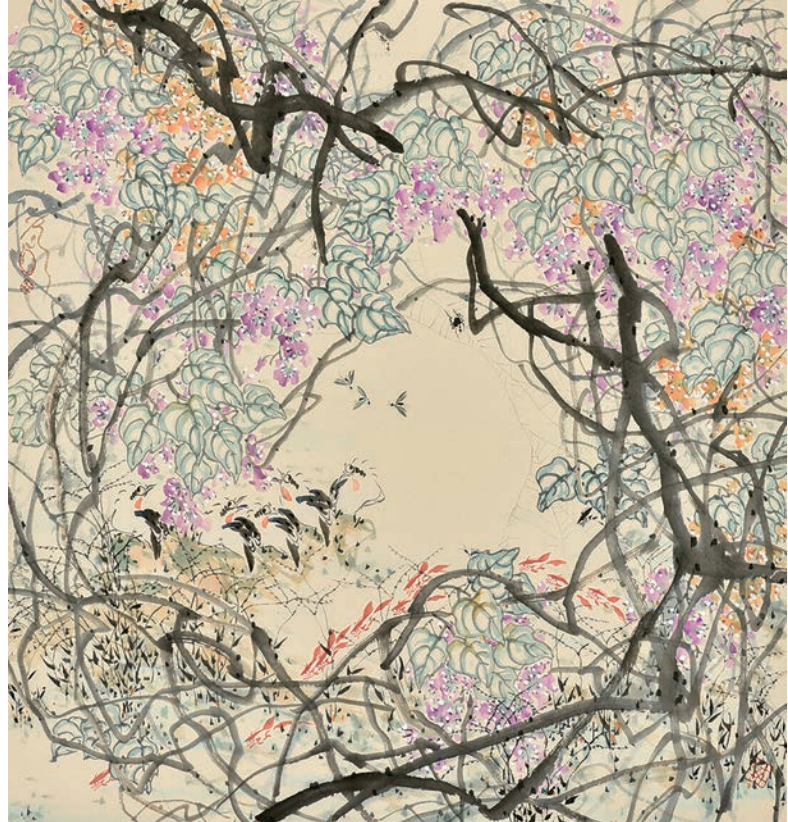
虽然陈振文学习的是西洋美术，但更喜欢水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反而造就了他与一般意义的水墨画家之不同。他有扎实的素描功底，在画面的造型取势上反而更加得心应手。如《历代名画记》所言，古代的中国画不重颜色，重在线条与画面意境，即使敷色，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偏淡的，这与陈振文的趣味和技法倾向高度吻合。

中国画所崇尚的主题理念、表现方式及技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洋画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陈振文喜欢中国画里大量的、充满诗意的留白，喜欢八大山人的简练、冷静、孤傲、朴拙，以及高超的造型能力。新加坡本地书画界普遍推崇中国海派风格，对海上画派领袖吴昌硕及其弟子的作品甚为推崇，但陈振文的视觉品味更进一步，更纯粹。他喜欢齐白石，齐白石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吴昌硕，但齐白石以非文人视角的质朴与达观，在事实上超越了吴昌硕，也让当时日本、欧洲的艺术界刮目相看。特别是他的印章，有棱角，锋利，出手即不回头，潇洒利落，这些正是陈振文的艺术标准与理念，也是他最为欣赏和看重的。

中国文人体系和知识界历来推崇山水画，认为山水画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载体与极致表现。但新加坡没有高山大河，只有小河小溪，几座小山也气势太弱。如何在新加坡画出中国水



《荷香游鱼》纸上彩墨 96X90cm (2024)



《华阴蜜语》纸上彩墨 96X96cm (2025)

墨画里有至高精神地位的山水意象，成为所有南洋水墨画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没有山水，就创造新的山水形式——陈振文想到了熟悉的童年甘榜生活——“起初从花鸟中寻出在没有山川的国度创作水墨画的途径，后又在豢养的龟鱼塘中窥出热带湿地的山水意象，在精神上走了整整一圈，以崭新的思维面对之前的困境。对一位艺术家而言，这应当是创作生涯中少有的几次突破点，值得珍惜，更值得发展。”^[2]

因为童年生活的缘故，陈振文重点表现湿地风光题材，以小写意风格和大胆的现代构图方式，注重留白，与观众分享他心中的双溪布洛等湿地与渔村的意境，通过可以清楚分辨的近景与远景，描绘花鸟鱼虫的出没，显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但可惜的是，很多曾是抓螃蟹、抓鱼的沼泽和渔村正在渐渐被城市化与现代化取代。不过，大部分本地画家依然偏好以西洋风景画的视角描绘新加坡的大街小巷、码头，尤其是新加坡河两岸的景观。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图画未免也有令人乏味的时候，以至于曾有一个时期，一些持不同看法的画家在报章上对这一现象发起公开讨论，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能代表新加坡本土风物的题材与文化视觉符号。

陈振文放弃纯粹使用中国画颜料的保守观念，把水彩画颜料用在宣纸上，调出与中国画颜

料不同的色彩效果，其所画南洋的热带颜色与感受，有别于中国画的传统意象。他并不十分有意地要体现所谓南洋风、南洋的景物，只画自己熟悉的、有强烈内心感受的花草、小鱼与景物，画比较空灵的境界。他十分强调用笔，以笔意演绎中国艺术“书画同源”的技术源流，以双钩法为主，用月宫殿半生熟纸，凸显笔墨浓淡干湿，重视造型与构图，画面干净，浑厚，稚拙，超凡脱俗，在水墨世界里追求空灵的禅意境界。

无为而治，无为无不为

陈振文的太太受英文教育，对逛画展、办画展没有过多兴趣，但她仍然支持陈振文的事业，做好贤内助。陈振文对画画则一直保持着冷静而清醒的态度——独自一个人，持续的深爱，灵活而有连贯性地坚持创作，以自娱自乐的精神，不强求任何不切实际的奢望。即使获得大奖之后，他名声鹊起，时常有大型机构以进一步推广其市场知名度和收藏热度的说法，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邀他创作一些他本人不十分擅长但却非常应景的画作，陈振文每次都是温和有礼地婉言谢绝。他对名誉与金钱看得很淡，不想钻很多人打破脑袋都想挤进去的圈子，不想凑热闹，只想画自己心里想画的和有把握画好的，有感而发地创作，对得起每一件作品。至于篆刻，他也



《画里画外》纸上彩墨 92X92cm (2025)

是抽空来做，感觉有了就挥刀刻石，也不需要多大的空间，随手拿起，随手放下。

大凡有引领作用的艺术形式都有赖于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想基础，新加坡艺术圈中挥之不去的南洋风，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维度里偏于技术形式和风格，在哲学、信仰及理论内涵上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有了像陈振文这样清醒而有独创能力的画家，以及一大批不断奋进、勇敢前行的画界同仁，未来的日子依然是可期的。

注释：

- [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注释），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 [2] 陈咏峻，《潮湿的记忆：论陈振文湿地画作》，《无心墨迹——陈振文画集》，2022年。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西方美术史博士）

Tan Chin Boon, An Artist Ripen Late

Tan Chin Boon (1953-) was born in Singapore to a family of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Nan'an, Fujian, which makes him a second-generation citizen. In 1970, he was enrolled in the Western Art Department at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NAFA), also taking a minor in Chinese painting. At that time, See Hiang To taught the "flowers and birds" style, while Chen Chong Swee focused on landscapes—specifically, depictions of Malay kampungs or fishing villages.

Despite Tan Chin Boon's long involvement in the arts, his engagement has been somewhat intermittent and disassociated. Had it not been for his daughter's unexpected, bold encouragement and urging, he would never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nnual UOB Painting of the Year competition. He chose the small fish—a topic most familiar to him—as his theme, depicting a shoal of tiny fish swimming head-to-tail in carefree joy among wetland plants and kampung ponds. This "joy of the fish" symbolises a persistent theme and a profound emotion that has long resonated within Tan Chin Boon. His daughter handled every step of the process—from registration to the submission of the artwork—and when he ultimately received the notification that he had won the Gold Award in the Established Artist Category for 2024, he accepted the news with a tranquil and composed demeanour. Competing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t the age of seventy and winning a major award with just one entry appeared to be a surprising twist of fate, yet it felt remarkably appropriate and destined.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Tan Chin Boon by others is that of a genuine gentleman—a man with a kind disposition and refined character. He greets people with a humble smile, though more often than not, he remains silent; whether others are engaged in lively discussion or gesticulating wildly in conversation, he simply listens quietly, observ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a calm indifference. Within the local art community, he appears as a wise figure who has attained enlightenment—one with profound insight who sees through the chaotic scramble for fame and fortune that defines ordinary life. He nurtures his inner tranquility amid the grime of daily life, neither recoiling in disdain out of a sense of aloofness nor into solitude due to loneliness. Perhaps, in a past life, he was that very fish mentioned by the ancient philosopher Zhuangzi—the one that had long ago lost its sense of self and found perfect freedom within the vastness of the rivers and lakes. In his residence in the Hougang region, Tan Chin Boon keeps several large vats filled with typical small fish—not rare or prized breeds, but familiar species. He explains that these are the very same kinds of fish he used to play with in the village ponds during his childhood—animals that once brought him countless hours of incomparable joy. He opened up the partition between the living room and the balcony, the spacious balcony a seamless continuation of the interior. Seated within the room, one can fully embrace the sunlight, the rain, and the gentle breezes. The space is adorned with large green plants and vintage ceramic vases with exquisite decorative designs. Inside these vases, schools of small fish swim—sometimes darting quickly, sometimes moving leisurely—with a sense of absolute freedom and ease, completely un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y live in a man-made enclosure or if a larger, more expansive, and beautiful world lies just beyond.

Tan Chin Boon abandoned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of using only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igments; instead, he applies watercolour pigments on Xuan paper, resulting in colour effect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a. His depictions of the tropical colours and sensations of the Nanyang region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imagery typically found in Chinese painting. He does not intentionally aim to merely depict a generic "Nanyang style" or specific Nanyang scenery; instead, he paints only those flowers, fish and landscapes with which he is intimately familiar—subjects that stir deep feelings in him—striving to capture a realm of ethereal spirituality. He emphasises on brushwork significantly, using the expressive purpose of the brush to reflect the technical heritage of Chinese art—specifically the principle tha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ve a shared origin. Utilising primarily the Shuanggou (double-outline) technique, he emphasises form and composition; the resulting images are clean and substantial, infused with a charming naivety and exhibit a transcendent, otherworldly quality.

In addition to painting, his artistic pursuits also include seal carving. Chinese painting traditionally follows the principle that one whose calligraphy lacks vigor and strength cannot create great paintings, and seal carving is viewed as the lapidary embodiment and manifestation of calligraphy.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is exquisite seal-carving artistry has received immense recognition, lead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ree dedicated monographs on the subject.

法国喜剧

在新加坡戏曲舞台上的双璧



文·蔡曙鹏

图·活动主办方提供

2025年适逢新加坡与法国建交60周年，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陈子宇的牵线下，中心与新艺剧坊开始筹划将法国剧作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于1897年创作的喜剧《大鼻子诗人西哈诺》，改编成粤剧《大鼻子情圣》。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新编粤剧《大鼻子情圣》于2026年4月18日及19日在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厅举行首演。该剧由香港粤剧名伶罗家英与本地粤剧团体新艺剧坊联合呈献，也为新加坡与法国建交61周年增添了一场跨越语言、地域与艺

术形式的文化交流。

不过，这并非法国经典喜剧第一次在新加坡戏曲舞台上获得新生。早在2007年，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便已被改编成歌仔戏，以本土化的人物、语言和唱腔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今，随着《大鼻子情圣》的上演，两部取材自法国经典喜剧的作品——一部粤剧，一部歌仔戏——在新加坡戏曲舞台上遥相辉映，成为跨文化改编的“双璧”。





《大鼻子情圣》中，罗家英饰演朱不凡，陈玲孜饰演徐绮珊



罗家英和陈玲孜在终场戏中声情并茂

《大鼻子情圣》： 法国浪漫爱情的粤剧新生

罗家英与《大鼻子情圣》的缘分，始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新加坡。1969年，年仅23岁的他第一次来新加坡演出，无意间在青年书局购得《大鼻子情圣》的中文译本。当时，他便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移植为粤剧的作品，只是自觉功力未到，不敢贸然尝试，但他始终对这个剧本念念不忘。

近年来，罗家英曾想将作品搬上粤剧舞台，却因合作演员档期不合等原因未能成行。直到2024年，这个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终于实现。粤剧《大鼻子情圣》在香港首届“中华文化节”首演，翌年于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重演，今年又先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和天津滨湖剧院上演。

《大鼻子情圣》多年来曾被改编成电影、音乐剧和芭蕾舞剧。罗斯丹原作中的主人公西哈诺文武双全，却因天生长着一个大鼻子而深感自卑，暗恋表妹罗克珊却始终不敢表白。罗克珊倾心的，则是西哈诺军中英俊帅气的克里斯迪安。这个腹无点墨的粗人请西哈诺代写情书，甚至替自己在月色朦胧的夜晚向罗克珊诵读情书，两人因此坠入爱河。后来克里斯迪安战死沙场，西哈诺继续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直到他临终前罗克珊才知晓真相。

罗家英将这段发生于17世纪法国的爱情故事移植到粤剧舞台，对原著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和戏剧结构进行了重新梳理。粤剧版将故事背景迁移至明代“土木堡之变”时期，将原作的五幕剧也重新编排为六场戏。主人公西哈诺化身为神机营队长朱不凡，罗克珊成为郡主徐绮珊，克里斯迪安则变成相貌俊朗的朱翊豪。

故事从戏园里的打闹开始，带出神机营有一个大鼻子队长朱不凡与他貌如潘安的知己朱翊豪，两人同时爱上郡主徐绮珊的曲折情节。翊豪腹中无点墨，朱不凡冒翊豪之名，却寄托着不凡的真挚感情，这些深情款款的情书深深打动了徐绮珊。后来翊豪战死，徐绮珊到尼庵静修，朱不凡定期前往探望。一次徐绮珊请负伤的朱不凡读信，他竟然能背诵翊豪写的情书，才知道朱不凡的深情。

这一改编并非简单地为法国人物换上中国姓名，而是一次从戏剧文本到粤剧舞台的文化转译。罗家英保留了原作关于爱情、自卑、忠诚与牺牲的精神内核，同时以粤剧特有的唱腔、身段和写意美学重新建构人物关系，让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获得鲜明的东方神韵。

在新加坡版《大鼻子情圣》中，罗家英饰演朱不凡，新加坡粤剧演员陈玲孜则饰演徐绮珊。两人在剧中演绎一段深藏半生、至死方休的爱情；在舞台之外，他们的粤剧缘分也已延续数十年。

1969年，罗家英首次来新加坡演出时，朱敬芬姐妹曾与这位年轻的粤剧演员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朱敬芬的女儿陈玲孜年纪尚小，却因自幼成长于粤剧氛围浓厚的家庭，在母亲的谆谆教导和耳濡目染之下，逐渐建立起对粤剧的认识与热爱。后来，她又有缘得到上海京剧名家陈蓉芳指导，为日后的舞台表演打下坚实基础。

1984年，罗家英到新加坡西北门演街戏，朱家姐妹与他再次相遇。当时，朱敬芬正在筹备《八宝公主》，便向罗家英请教如何把戏演好。罗家英爽快答应，双方自此展开了长久的艺术合作。

1991年，陈玲孜参加“新港伶影艺粤剧大汇演”，首次与罗家英同台献艺，开始崭露头

角。此后，她又与罗家英合作演出《狄青》，并参与为丰加北慈善活动呈献的《杨枝滴露牡丹开》等节目。在名师指点下，她孜孜不倦地学习，唱腔与演技日益精进。

十六年后，陈聆孜获邀到香港沙田大会堂演出，其唱腔与演技获得香港粤剧界肯定，也为她继续走在粤剧道路上增添了新的动力。近年来，她多次与黄伟坤、黎骏声、苏小惠等粤剧名伶合作，主演多部经典剧目。2025年，她在《女儿香》担任女主角，这部粤剧经典要求女主角同时掌握花旦、武生、闺门旦与刀马旦四个行当的表演特色，技艺要求极为全面。她凭借长期的艺术积累、热爱与求索，再次攀上个人粤剧生涯的新高峰。此次在《大鼻子情圣》中饰演徐绮珊，既是陈聆孜与罗家英数十年艺术缘分的延续，也让两代粤剧人的默契，在这部跨越中西文化的作品中获得新的呈现。

全剧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在“不了余情”一场。陈聆孜以凄清委婉的唱腔演绎《别离吟》：“怀念往昔恩爱多欢畅，同弄影翻翠袖。带怨带着愁，千缕恨顿起罩眉头。秋风哪堪扫落霞埋藏，冷枫山径后，暗自思，暗自想，似落花永伴愁。怨未央，生死别，经年凝眸泪沾襟袖。”凄清哀怨，听者不禁唏嘘，扼腕叹息。

到了全剧最后，身负重伤的朱不凡终于向心爱之人倾吐埋藏多年的情意。罗家英唱道：“一生潦倒，荒诞不羁，不贪贵显，只爱清幽。别矣一众良朋挚友，盼他生，再碰觥筹。痴心似水东去不休，归去系上千万愧疚。离别了，执手痛牵袖，刻骨之爱万世留。世间事别了，尽量诉心中爱意，唯愿后世千秋之后，任那歌咏漫奏。”最后，重伤的朱不凡向心爱的人表白后，死而无憾。

新加坡版《大鼻子情圣》因地制宜，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作了精简，将演出时间浓缩至两个半小时。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协助将剧中的唱词和对白翻译成法文，并联系法国学校，安排5名学生参与演出。这些青少年认真学习粤剧，身段和动作也练得有板有眼。通过亲身参与，他们不只是观看一门陌生的东方艺术，也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真正走进了粤剧的表演世界。

陈聆孜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促成此次合作，让她有机会再次与罗家英同台，心存感激。她说：“罗老师排练时，会先带着大家把整本剧

本唱一遍，再进入走位和表演。这种做法在新加坡并不常见，我们通常会直接进入表演阶段。这样的唱段练习其实对我们十分有帮助，大家能专注于把唱腔唱准。罗老师也会讲解各唱段需要表达的情感，让演员在从一开始就理解情绪的传达方式。完成唱腔练习后，再进入动作、站位等表演环节，演员便能够更加专注，排练也进行得更有效率。除了专业指导，也让我们知道掌握戏的节奏，对整部戏的呈现清晰的认知，从而提升作品的水平。这部戏由三十几个演员和近六十人的制作团队共同努力，为我们的跨文化粤剧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屈打成医》： 莫里哀喜剧的歌仔戏转身

与《大鼻子情圣》的浪漫深情相比，莫里哀的《屈打成医》则以误会、错位和夸张的闹剧手法，展开对现实社会的辛辣讽刺。

法国喜剧作家、演员和戏剧活动家莫里哀创作于1666年的《屈打成医》，取材自法国中世纪韵文故事《农民医生》。全剧延续了意大利假面喜剧与法国闹剧的传统，通过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农民形象，展现民间智慧，同时讽刺当时缺乏医德、借病敛财的医生群体。

原作讲述樵夫斯卡纳赖尔与妻子失和，妻子为图报复，把丈夫当作名医介绍给一富绅，为其女儿“治病”。最后，斯卡纳赖尔凭其智慧和勇气，不仅找到姑娘的“病根”，而且还使其如愿以偿地与所爱青年结成眷属。

2007年，新加坡戏曲学院决定将《屈打成医》移植为歌仔戏。改编后的歌仔戏版中，富商



歌仔戏版本《屈打成医》演出笑声不断

罗员外的女儿罗珍珠与年轻善良的穷大夫杜仲情投意合，爱财如命的父亲罗汉果却逼迫她嫁给一名有钱的老头。为了反抗父亲安排的婚事，罗珍珠故意装作失声，成了“哑巴”。

另一边，爱喝酒、性情懒散的酒夫当归，经常在没有钱买酒时打骂妻子燕窝。燕窝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丈夫。得知罗员外命家丁阿福和阿成四处寻找医生为女儿治病，她灵机一动，谎称自己的丈夫是神医，只是必须动手打他，他才肯承认自己医术高明。当归无端招来一顿棍打，只好随两名家丁前往罗家为小姐治病。当冒牌医生知道小姐装病是为了抗婚，便设计了小姐与心上人私奔的计划，故事有了完美的结局。这个喜剧讽刺势利的罗员外，也批判欺负老婆的男人，歌颂纯真爱情。

这项跨文化创作计划很快获得法国语文学院（Alliance Française）与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支持。时任法国语文学院主管Pierre-Emmanuel Jacob深受这个创意打动。他认为：“歌仔戏版的莫里哀名剧，能让许多歌仔戏观众对法国戏剧文化产生兴趣，也让法国观众认识歌仔戏，是双赢的合作！”

法国语文学院不仅免费提供剧场作为首演场地，也通过网站和杂志发布演出消息。演出果然吸引了不少法语背景的观众。法国大使Pierre Buhler、比利时大使Marc Calcoen、柬埔寨大使Sin Serey，以及多个国家驻新使馆的参赞与外交人员，都到场观看《屈打成医》的首演。

后来，该剧在共和理工学院演出时，担任主宾的国会议员李玉云评价道：“观众既欣赏到法国人的浪漫，又享受了歌仔戏的美妙唱腔！”这

番话也给演出团队带来莫大鼓励。

在南洋学会与南华潮剧社联办的“2026年多元文化传统戏剧国际研讨会”上，曾观看过《屈打成医》的梁勇博士指出，借鉴外国题材进行艺术再创作，与文字上的直接翻译有很大区别。改编外国戏剧，涉及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戏剧场景等多方面的转换。

他认为，歌仔戏《屈打成医》首先通过人名换成中药，男主角叫当归，妻子叫燕窝，其他人物还有杜仲、罗汉果等。以中药材命名人物，不仅容易让观众记住，也一下子增强了全剧的喜剧感。与此同时，改编通过增添喜剧元素和戏剧冲突，使故事更具起伏。梁勇形容，这部作品“手法新颖，剧情轻松，令人嘻哈绝倒”。

导演洪秀玉长期致力于推动跨文化戏剧创作。她认为，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戏剧形态、编剧风格和艺术视角。引进西方戏剧名家的作品，能够吸引新的观众，让他们领略不同国家的艺术风采及其蕴含的文化思想。但前提是保留原著的流畅手法和幽默风采，采用民间俗语和民间典故，运用闽南俗语，让鲜明的地方色彩成为亮点。

因此，歌仔戏版《屈打成医》大量采用中国民间谚语、歇后语与闽南语口语。例如，剧本以“床头吵架床尾和”表现当归与燕窝虽然时常争吵，彼此之间却仍有深厚的夫妻感情；邻居则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责怪燕窝，既贴近民间生活，也增添了舞台上的喜剧效果。

除了人物与语言的本土化，唱腔设计也是这次改编的重要部分。华族戏曲剧种繁多，每个剧种都有独特的表演特点和唱腔风格。《屈打成医》全剧共有28个唱段，洪秀玉根据剧情内容、人物个性和情绪变化，选用了都马调、送莲花、昌调、七字仔、南方谣等不同曲调。这些唱腔节奏有快有慢，情绪有悲有喜，既须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也要配合剧情发展，使全剧呈现出鲜明而富有变化的节奏美。

戏曲唱词也讲究押韵。押韵不仅赋予唱词鲜明的文学气息，也有助于强化音乐节奏，吸引观众注意力。当归一出场便唱道：“流年不利多灾荒，日子实在太艰难。三月无雨地干旱，青草变黄树枯干。砍柴换来菜和饭，凑凑合合当晚餐。买瓶美酒来陪伴，借酒消愁解忧烦。”丫鬟春红则以另一段唱词，道出罗珍珠装病抗婚的缘由：“高家已有万贯财，重利轻义太不该。婚姻



新加坡歌仔戏版本《屈打成医》
被移植为中国曲剧

大事讲缘分，不可为钱乱安排。婚姻大事自己来，追求幸福莫等待。瞒天过海假痴呆，装聋作哑无人知。”

唱词节奏明快，既推动剧情，也鲜明表达人物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法国喜剧中的人物冲突和讽刺意味，由此被转化成具有华文韵律与歌仔戏音乐特色的舞台语言。

歌仔戏版《屈打成医》自2007年首演以来，又先后于2008年、2009年、2016年、2021年和2022年登台，其中一次更名为《哑女与神医》。中国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计划在2027年将新加坡版《屈打成医》移植改编并搬上舞台，为新中两国的戏曲交流写下新的一页。

当法国喜剧遇见新加坡戏曲

《大鼻子情圣》和《屈打成医》，是法国戏剧与新加坡戏曲展开的两次文化对话。前者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合发起，并获得法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支持，在新法建交61周年之际登上舞台，也成为新加坡、法国与香港三地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实践。后者由戏曲学院发起，在法国语文学院大力支持下完成，首演更吸引法国、比利时和柬埔寨等国驻新使节及外交人员到场观赏，成为法国戏剧与新加坡戏曲交流的一场盛事。

两部作品虽然分别以粤剧和歌仔戏呈现，却都不是对法国原作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融入华族戏曲的语言、唱腔和表演形式。作为一座汇聚多元文化的国际都市，新加坡为不同艺术传统的相遇与对话提供了丰富空间；这样的跨文化创作，也将为华族戏曲的赓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传统艺术在当代舞台上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Two French Comedies Find New Life on Singapore's Traditional Opera Stage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 society has long encouraged artistic conversations among various cultures. Among the most remarkable examples are two French comedies that have been effectively adapted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the Cantonese opera *The Great Lover with the Big Nose* (based on Edmond Rostand's *Cyrano de Bergerac*) and the Hokkien opera *The Doctor in Spite of Himself* (derived from Molière's classic comedy). These productions show how Western theatrical classics can be transformed using the aesthetics, music, and performance styles of Chinese opera while still resonating with contemporary viewers.

The more recent production, *The Great Lover with the Big Nose*, was presented as part of the festivities commemorating more than 60 years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France. Initiated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and produced by OperaWorks (Singapore), the Cantonese opera was adapted, directed, and featured renowned Hong Kong opera artist Law Kar-ying. Instead of just translating the original, Law shifted the narrative from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to China's Ming dynasty amid the Tumu Crisis, creating a culturally convincing setting for Cantonese opera. The motifs of unspoken love, dignity, loyalty, selflessness, and poetic expression were maintained whilst the characters, costumes and dramatic structure were thoroughly sinicised.

A major highlight of the production was the performance by Winsome Chan, a Singaporean Cantonese opera actress, whose extensive artistic journey reflects the dedication necessary to excel in traditional theatre. Having trained under distinguished teachers and collaborated with Law Kar-ying for many years, she infused emotional depth and refined vocal skill into the role of Xu Qishan. The production also incorporated novel rehearsal techniques and involved a large Singaporean creative team working alongside artists from Hong Kong.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rench Embassy, French subtitles were created and French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making it an authentic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In 2007,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was the Hokkien opera version of Molière's *The Doctor in Spite of Himself*, produced by the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Singapore. The play was transformed into a uniquely local piece through inventive adaptation rather than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characters were assigned distinctive Chinese herbal names, the dialogue incorporated Hokkien idioms and Chinese proverbs, and the humour was enhanced with recognisable local expressions. While upholding Molière's satire of societal hypocrisy and medical pretension, the opera also honoured love, family values, and practicality in ways that resonated with Singaporean audiences.

The production garnered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the Alliance Française de Singapour and the French Embassy. Its premiere attracted diplomats from France, Belgium, Cambodia and various nations, demonstrating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can serve as a powerful medium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 The opera's vibrant music, rhyming lyrics, and colourful performance style presented French dramatic literature to audiences who may not have otherwise experienced it. Due to its popularity, the production was successfully brought back multiple time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Despite being created nearly two decades apart, both productions embody the same artistic philosophy. Both honour the spirit of the French originals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performance traditions of Chinese opera. Their success stems from creative localisation rather than imitation, enabling audiences to connect with universal human emotions through recognisable theatrical styles.

As a global city where cultures constantly engage, Singapore provides a rich environment for such artistic exploration. The adaptations of *Cyrano de Bergerac* and *The Doctor in Spite of Himself* illustrate how traditional opera can remain vibrant by interacting with world litera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y show that cultural exchange is most meaningful when it fosters new artistic creation rather than simple reproduction, allowing both French drama and Chinese opera to continue to thrive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金门籍海峡华人

王三龙家族



文图·陈煜

武

吉布朗华人坟场的再发现，使得王三龙家族重回公众视野，令人惊觉王三龙夫妇墓是新加坡现存最大的华人墓葬，其家族三代五座墓集合形成家族葬域。由于家族成员墓碑上均雕刻“金门”二字，王三龙家族的祖籍被视为金门。2012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出版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收录155位闽籍名人，包括王三龙（Ong Sam Leong, 1857-1918），将其定为“祖籍福建省金门县企业家”。2015年新加坡金门会馆出版《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收录了王三龙，其长子王文达（Ong Boon Tat, 1888-1941）与长孙王长辉律师（Ong Tiang Wee, 1909-1999）。

王三龙家族可以说是新加坡三代传家的望



王三龙（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族。新加坡有两条道路分别以王三龙和王文达命名，即三龙路（Sam Leong Road）和文达街（Boon Tat Street）。目前对于王三龙的记述多源自1923年宋旺相编撰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由林博爱主持编撰的五册《南洋华人集传》却没有记载王三龙家族成员。1950年沈渭泽编纂出版的《新嘉坡华侨名人传》，以中英双语介绍了王长辉的教育与职业经历，以及婚姻家庭。本文通过整理新闻报道与墓葬信息，梳理王三龙家族谱系与商业成就，探讨海峡华人家族的传承。

金门籍的王三龙家族

尽管王三龙家族墓碑显示其祖籍为金门，但没有记录其祖籍村。本地金门籍文史工作者吕世聪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与台湾文史工作者林建育共同撰写题为“再探王三龙及其家族”的文章，于2019年8月12日刊发于《联合早报》。文中指出在金门发现一部《金门东沙太原衍派族谱》，原修于1915年，重抄于1946年。在这份族谱里有一位后裔标注为“龙”，其字右下方标注“出洋英属石叻”。据称这位王氏后裔全名为王应龙，因此推断他就是王三龙，为金门东沙王氏，其父为王文褒。

笔者对于这一推断存疑，原因是王三龙出生于新加坡，并非“出洋英属石叻”的一代。沈渭泽编纂的王长辉小传称：“王氏堪称为最早移殖星洲吾侨先辈之后裔，并可追溯至一百五十年前马六甲历史。”目前普遍认为王三龙出生清寒，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他能以弱冠之龄自立门户，笔者推测其父辈可能由马六甲南迁至新加坡，对马来半岛和海峡殖民地并不陌生。

位于姓王山的王三龙家族墓葬保存较为完

整，相关的研究项目对于其家族成员的墓碑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为理清其家族谱系提供了重要依据。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寻获王三龙父亲的墓葬，亦无法验证其父是否名为王文褒。目前所知最早葬于王三龙家族墓域的是其母亲“王门陈氏谥俭慈娘”，墓碑记录显示她于光绪甲午年七月初七（即1894年8月7日）去世，在世的三位儿子是三杰、三龙、三美；两位女儿为金娘与冰娘；四位孙子为鍊铨、鍊镛、平福、平和。这座单人墓形制简朴，墓碑上部装饰回纹图案，墓台前雕刻“福禄寿”的字形图案。

王三龙家族墓葬群中，以王三龙与妻子杨贤娘（Yeo Hean Neo, c.1862-1935）的双穴墓最为宏大精美。该墓坐落在山坡之上，面积高达600平方米。除了墓碑与墓手装饰大量精美的青石雕以外，墓埕亦满铺装饰性花砖，并在两侧设有石雕狮子与锡克族守卫。1918年2月7日，王三龙在其武吉知马路豪华宅邸玫瑰山（Bukit Rose）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60岁，于3月3日安葬于姓王山墓地。1935年5月25日，王三龙夫人杨贤娘逝世，享寿73岁，6月2日与夫同葬。两人去世的时间相隔17年，葬礼皆极为隆重，柔佛苏丹专门派遣乐队前往助阵。

杨贤娘出生于久居马来亚的霞阳杨家，是马来亚最早接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女性之一。本地媒体称其乐善好施，鼓励丈夫创业，亦协助他在新加坡和圣诞岛建立各种商业关系。王三龙去世时，遗嘱指定杨贤娘为其产业的执行人，王文达为信托人。王文达亦坦言，与弟弟平福创办新世界游乐场是受到母亲的启发与鼓励，她喜欢观看马来歌舞，他们就创办马来歌舞团以娱亲。

王三龙公司产业经营

王三龙被称为“是协助缔造马来亚繁荣的先驱之一。生前在整个马来亚乃至更远的地方都有着广泛的商业网络。”宋旺相曾对王三龙的产业经营做出概括，称王三龙21岁时自立门户做委托代理的小生意，起家于土地交易，后有志于马来半岛彭亨（Pahang）和甘马挽（Kemaman）的伐木业。1899年他以王三龙公司的名义获得圣诞岛磷酸盐有限公司（The Christmas Island Phosphate Co. Ltd.）的供应合同，经营峇淡砖场，设立多处火锯厂，亦参与房屋建造和橡胶种植。查阅早期新闻报道时，笔者注意到1882



王三龙后裔捐献的神龛，正中画像为王三龙与杨贤娘，上方为王文达与两位妻子的照片（图源：Roots）

年6月13日一位名叫Ong Sam Leong的人在警察局为一桩商务纠纷提供证词，称其为Maclaine Fraser公司雇佣约一年左右，担任称量与记录货物的职员。笔者推测该证人即王三龙，其职业年龄与宋旺相所描述的相符。

王三龙创立的王三龙公司（Ong Sam Leong & Co.），早期主要经营马来半岛木材的采伐加工。1897年的一则法庭审判显示，王三龙公司在彭亨设有伐木场，其雇佣的一位欧亚裔管工虐待华人苦力致死。同年的另一桩关于王三龙公司与海峡发展公司（Straits Development Co.）的经济纠纷案，记录两家签订的1895年3月5日至1896年10月31日期间的月度木材供应量，显示王三龙公司在彭亨的木材采伐具有相当的规模。1910年代王三龙公司的广告显示，其主营业务为蒸汽火锯与总承包商，有充足的木材和木板供应，包括各种尺寸的硬木，有大量的柚木现

货，能够迅速处理订单，其蒸汽火锯厂位于加冷，总部设在罗敏申路41号。王三龙也以创办联合火锯有限公司（the United Saw Mills, Ltd.）而广为人知。

王三龙公司从木材采伐加工发展成建筑材料供应商与总承包商。1900年代新加坡市政会的记录显示，王三龙公司是和政府签约的石料供应商之一，每月从乌敏岛开采提供高达1200吨的花岗岩。由于城市发展对于石料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不得不提高其石料的收购价格。值得关注的是，基于王三龙在建筑业的经验，政府在遇到工程事故问题时，往往邀请他担任裁判员，协助勘察现场以判定事故原因。

王三龙的发迹常常被认为是因1899年获得圣诞岛磷酸盐有限公司的垄断合同，《世界福建名人录》一书所称的“杂货供应权”相信是译自宋旺相所写的“universal provider”。笔者推测王三龙公司所提供的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与劳动力供应等。现隶属于澳大利亚的圣诞岛，于1900年并入海峡殖民地，依赖马来亚资源开采磷酸盐矿。该岛与新加坡相距1000多公里，依靠航运往来，王三龙为此常常乘坐Islander号轮船前往视察。王文达亦曾前往该岛视察，以处理当地因粮食供应短缺引发的暴乱。

子承父业的王家兄弟

王三龙与杨贤娘育有两子三女，长子文达，次子平福，均在莱佛士书院接受英文教育。聪慧的王文达学业优异，在校期间曾获得牙直利奖学金（Guthrie Scholarship）。然而，他没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是在19岁的年纪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庞大的产业。本地英文媒体如此描述他：

“文达先生年纪很轻，却非常聪慧，是其父亲生意的唯一经理。他有很多欧洲朋友，虽然还留着长辫，但他的思想与行为都相当的现代。”

1908年10月，20岁的王文达与温深娘（Oon Chim Neo）结婚。她是中华女学最早的学生之一，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其父是洋行的首席账房。王三龙为长子结婚举行长达10天的庆祝，在振瑞路91号（No. 91 Chin Swee Road）宅邸



王三龙与杨贤娘墓（笔者摄于2019年4月3日）

大宴各族宾客。次年，温深娘生下儿子王长辉。不幸的是，她于1917年3月12日去世，年仅31岁。其单人墓的墓埕开阔，墓手装饰典雅的彩色瓷砖，以“孝男长辉”之名立于丁巳年二月拾九日（即1917年4月11日）。

王文达参与经营后，王三龙公司于1912年初买下著名的峇淡砖场（Batam Brickworks），在欧洲技师的监督之下生产全尺寸的标准砖。除了公司自销外，亦聘请洋行作为经销商，并招募掌握华英双语的华人助理经理以扩展业务。王三龙公司在建造业有着丰富的经验，1912年亦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买下87英亩土地，展开荷兰公园产业计划（Holland Park Estate Scheme），建造舒适实惠的房屋，供应给本地的欧洲人。

王三龙公司也开始代理时兴的洋货，包括米其林轮胎、汽车、灭火器等。1920年，王文达与华人头家们创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The Overseas Chinese Assurance Co. Ltd.），担任第一董事，后改任副主席。在弟弟王平福的协助下，王文达也将王三龙公司的业务扩展至檳城等地。两兄弟于1923年创办新世界游艺场，王文达常常将欧洲的时髦物品进口陈列在新世界。1932年9月，他进行了首次环球旅行，前往伦敦主持长子王长辉的婚礼。1936年7月，在医生的陪同下再度展开环球旅行。

身为建造业巨商的王文达在浦鲁打马岛（Pulau Damar Laut，现裕廊岛的一部分）自行设计别墅大厦，购买材料延请工匠建造，落成后常常在周末带着朋友去度假。不幸的是，1941年7月5日，别墅屋顶忽然坍塌，同行友人陈金瑞当场毙命，身受重伤的王文达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于



王文达与魏顺娘墓（图源：网络）



王平福与林育环墓（笔者摄于2022年10月15日）

7月8日身亡。法院判定两人因建筑工程质量问题死于不测，负责建造的木匠潜逃。

王文达意外逝世后，弟弟王平福与长子长辉主持了他的葬礼，并于1941年7月24日，将其安葬于姓王山家族墓域。葬礼极尽哀荣，数千人前往执绋，一路由皇家军乐队伴奏，警察部队维护治安。相较于父母的豪华大墓，王文达与续弦魏顺娘的双穴墓较为简朴。1968年5月7日王平福在新加坡逝世，与1959年12月18日去世的夫人林育环同葬于家族墓域。墓地采用西式做法，仅立有墓碑。

结语

对于王三龙家族产业经营的梳理，不难看出王三龙有着本地出生的海峡华人特征。虽然未受过高等教育，但他能够在洋行担任工作，为创业打下基础，很早就马来半岛开采木材；木材供应一直是王三龙公司重要的业务之一。随着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发展，对于建筑材料的需求与日俱增，王三龙公司的业务扩展至各类建材的供应，从乌敏岛的花岗岩开采，到峇淡制砖场的收购，以及房地产的开发等。王三龙家族的产业经营不局限于新加坡，能够获得圣诞岛的总承包合同，在马来半岛各州府有着广泛商业网络，与马来苏丹往来密切。

对于王三龙家族婚姻的分析，显示父子两代均迎娶接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女性，妻子及其母族对于家族发展存在影响。王文达与平福两兄弟均接受良好的教育，携手继承王三龙公司，对于马来亚社会有着相当的贡献。王文达于1925年4月25日获封为太平局绅，王平福于1963年8月获

得彭亨州苏丹颁发的拿督称号。王三龙家族的社会影响力由王长辉发扬光大，他在本地接受华英双语教育，后前往剑桥大学等海外名校修读法律与经济等，于1934年6月返回新加坡，成为杰出的律师，还担任众多社会职务，被推选为工部局议员等。

文献来源：

- [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23.
- [2] 沈渭泽编纂，《新嘉坡华侨名人传》，新加坡：南国出版社，1950。
- [3]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
- [4] 《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新加坡：新加坡金门会馆，2015。
- [5] 《联合早报》，2019年8月12日。
- [6] 《南洋商报》，1940年9月6日。
- [7] 《星洲日报》，1936年7月28日。
- [8] 《Malaya Tribune》，1941年7月9日。
- [9]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1908年10月26日。
- [10] 《The Singapore Daily Times》，1882年6月14日。
- [11]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1935年5月27日。
- [12] 《The Straits Budget》，1907年6月13日。
- [13] 《The Straits Echo》，1918年3月6日。
- [14] 《The Straits Times》，1911年2月18日。
- [15] 《The Sunday Tribune》，1935年5月26日。
- [16] Family of Ong Sam Leong, <https://tombs.bukitbrown.org/2020/07/family-of-ong-sam-leong.html>, accessed on July 21, 2026.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歌舞团

与早年新加坡的娱乐事业



文·叶舒瑜

图·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 Gems

1950年代，新马一带陆续出现许多歌舞团，团员们各有所长、身怀绝技，为本地娱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歌

舞团指的是结合歌唱与舞蹈的表演团体，大致活跃于1920至1960年代。

和早期南来的中国戏班不同，歌舞团一般主打“摩登、西洋、新派”等噱头，而歌舞表演以女性为主，男性则负责乐器演奏或行政杂务，演出内容也包括滑稽戏及新型话剧。不少歌舞团成员亦效仿好莱坞电影中时尚的“飞来波女郎”的齐耳短发造型，借以标榜“摩登女性”的身份。

1927年，黎锦晖（1891-1967）在上海成立歌舞学校，后来则发展演变成巡回歌舞团、歌唱社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黎锦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一致统称这些团体为“明月社”。明月社（也叫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歌舞团体。1928年，黎锦晖带着他的歌舞团成员到新加坡的“大钟楼”（维多利亚剧院）呈献多首歌曲以及舞剧《春天的快乐》，当时的广告亦主打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根据团员王人美（1914-1987）的回忆录，新加坡是明月歌舞团巡演的最后一站，因经营不善，团员们无法如期归国。^[1]黎锦晖遂应出版商要求编写了一批流行歌曲寄回上海以换取经费，后来这些歌曲，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不仅风靡乐坛，也让他一夜成名。黎锦晖的歌舞团培养了许多能歌善舞的女性，她们大多迅速被星探挖掘，并走入上



金星歌舞团的叶青

海影坛，也预示了歌舞团作为训练栽培明星的平台。^[2]

1933年，由魏紫波（生卒年不详）组织领队的“梅花歌舞团”抵达新加坡演出，团员蔡问津（1905-1975）见反应不俗，便返回上海组建了“白雪歌舞团”，团员有路丁、臧春风（生年不详-1951）、许新民、熊莉莉等人。^[3]1935年，

由上海商人刘达良（生卒年不详）创办的“万花歌舞团”在桥北路的中国戏院登台，首演满座。^[4]1938年，团长张蟾娥（生年不详-1945）带领“银月歌舞团”在新马一带演出，团员有孟丽君、马骏（生年不详-1986）、朱俊、白言（1920-2019）等人，并为了响应抗日运动而安排演出国防歌舞剧《大战之前夜》。^[5]在这之后，许多歌舞团皆保留了歌唱、舞蹈、歌舞剧或话剧演出的节目安排。

歌舞团的鼎盛期

白言（原名阎佰元，1920-2019）在口述访谈中便提到自己所属的银月歌舞团便曾和知名的影视企业邵氏兄弟公司签订合同，并借此打开知名度。当时，团友不仅有固定的收入，还有机会前往檳城、怡保等地“跑码头”演出。^[6]当时，不少文人墨客也爱看歌舞团、歌台的演出。例如1952年，刘以鬯（1918-2018）受邀来到新加坡担任《益世报》的副刊主编，便在金陵大旅店邂逅了未来的太太罗佩云；当时，歌舞团团员罗佩云与团员在快乐世界演出数日，包括一场反映“南洋风光现实生活”的舞剧《巴刹之恋》。^[7]1956年，罗佩云带领一班歌星、舞者组成的“天鹅歌舞剧艺团”再次前往新马巡回

演出，刘以鬯热烈追求，两人终于在1957年共结连理。^[8]

1950年代，新马一带的歌舞团与歌台如雨后春笋般冒起，减少舞剧、话剧演出，改以歌唱和舞蹈为主。例如，当时仅21岁的庄雪芳便自组了“庄雪芳巡回歌咏团”。不久后她便投入电影拍摄，客串李香兰（1920-2014）主演的《神秘美人》，之后更是凭王天林（1927-2010）导演的厦语片《天涯歌女》一炮而红。张莱莱则成立“莱莱歌咏团”，并于1951年与凤凰歌舞团在新世界合作演出，出现“晚晚狂满”的盛况。凤凰歌舞团的成员包括雷子荣和张莱娣（1941-1991），后者是沈常福马戏团的当家花旦。“脱衣舞皇后”陈惠珍（1925-1987）亦在1953年自组了“玫瑰歌舞团”。^[9]而由路丁招兵买马组织的“华艺歌舞剧团”、窦金怀（生卒年不详）领导的“大众歌剧团”、王进通（生卒年不详）领导的“海燕歌剧团”、白言领导的“金星歌舞团”等，皆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团体。

除了在游艺场演出，南星歌舞团艺人韩飞（1922-2013）回忆1949年，他们的歌舞团曾在国泰戏院演出，戏院内设有冷气，环境舒适。^[10]有些歌舞团会选择主打较为性感的舞蹈，例如罗佩云的歌舞团曾推出参考美国百老汇的

舞蹈“玉腿凌空”，以及陈惠珍推出的“贵妃出浴”等，因此不少人对歌舞团的印象不佳。然而，战后大部分的歌舞团还是比较严肃的，例如“凤凰歌舞团”的徐莲媚开创了“银神舞”，新生歌台的拿手杰作则是民间神话歌舞故事“牛郎织女”，而白言和太太叶青（1922-2016）在“金星歌舞团”结束之后，也曾开班授课排练民族舞蹈，积极培育本地舞蹈人才。^[11]



白言与叶青的结婚照



白言与夫人叶青表演俄罗斯传统舞蹈



战前银月歌舞团在大世界游艺场内演出话剧《深渊》《中国妇人》和《潘金莲》的广告，1933年至1950年代。

歌舞团与电影工业

新加坡于二战结束后出品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华侨血泪》（1946），便是由白雪歌舞团团长蔡问津投资及执导的。因为歌舞团的因缘，蔡问津在战前便熟悉新马一带。《华侨血泪》之后，他也陆续完成了《海外征魂》（1946）和《南洋小姐》（1947）。战前经营戏院以及游艺场的邵氏兄弟，也在战后看准时机迅速拍摄了《星加坡之歌》《第二故乡》和《度日如年》，并邀请吴村（1904-1971）执导，参与的演员则招募了随歌舞团抵新的马骏、叶青等人。1946年，歌手杨佩云独资买下“仙乐歌台”成为老板，邀请了陈美光（1933-2020）、熊莉莉、庄雪芳、林丽、巫美玲等驻唱，原本是歌舞团成员的白言、臧春风、关新艺（原名王裕煌，1927-1996）等也被请到仙乐歌台助阵。当中杨佩云、关新艺和庄雪芳后来陆续赴香港拍摄厦语电影，打下知名度。

1970年代，新加坡人熟悉的谐剧双宝王沙（原名王锦清，1925-1998）、野峰（原名萧添财，1932-1995）从歌舞团和歌台转投电影，为邵氏拍了一系列四部以“阿牛”为主的电影。^[12]在这之后，王沙与野峰继续在香港拍摄了多部电影，同时还录制多张方言谐剧唱片，据悉唱片一度热销到唱片公司才印好就连包装都来不及做好就直接上架。^[13]由此可见，

歌舞团与电影工业关系密切，这些歌舞团、歌台成员各个身怀绝技，也是本地娱乐发展史上重要的参与者。

注释：

- [1] 参见：〈第一个南来表演的中国歌舞团〉，《新明日报》，1987年2月14日，页10。
- [2] 关于黎锦晖的事业，参考：Andrew F. Jones,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3-104.
- [3] 部分团员生卒年不详。
- [4] 参见：〈万花歌舞团昨晚大献身手，轻歌曼舞余音绕梁，醉汉春梦美女如云〉，《南洋商报》，1935年3月6日。
- [5] 参见：〈银月歌舞团，今晚在皇宫公演“大战之前夜”〉，《南洋商报》，1938年10月5日。部分团员生卒年不详。
- [6] 旧时商贩以轮船运货，穿梭各个码头做买卖，作为营生的手段。在演艺、戏曲界，“跑码头”泛指艺人们到南洋各个不同的城乡演出。
- [7] 参见：〈香港歌舞团今晚推出大舞剧“玉腿凌空”〉，《南洋商报》，1953年11月6日。
- [8] 刘以鬯三毫子小说《椰树下之欲》的封面是一位身穿娘惹服装的年轻少女，其原型亦参照了罗佩云在本地演出之余拍摄的两张沙龙照。关于罗佩云与刘以鬯的爱情故事，参见：林方伟，〈重游星洲，追忆花样年华——罗佩云回到与刘以鬯的原点〉，《联合早报》，2023年6月8日。三毫子小说，指的是1950年代出版于香港的一系列通俗小说，通常薄薄一册，或八开或十二开。由于售价低廉，均以港币三角出售，粤语的三毫即三角，故统称三毫子小说。关于刘以鬯与三毫子小说，参见：萧永龙，〈刘以鬯的三毫子小说与再创作〉，收入氏著《南洋书话：香港、南洋、民国旧书刊记述》（台北：季风带文化有限公司，2023），页33-41。
- [9] 陈惠珍的传记。参见：Cecil Rajendra, *No Bed of Roses: The Rose Chan Story* (Penang: Clarity Publishing Sdn. Bhd., 2023).
- [10] 韩飞记得，当时在国泰一共有两场演出，分别是晚上6时45分至9时，另一场则是9时15分至11时30分，门票是六毛和一块。戏院楼上的座位由于设置的离舞台比较远，反而票价便宜，靠近前面楼下前排的座位则比较昂贵。参见：韩多义（韩飞），口述历史录音访谈，2005年3月22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2921），卷2，5。访员：Loke Tai Tay。
- [11] 参见：林弘谕，〈与舞蹈的一段缘〉，《联合早报》，1988年8月12日；洪铭铎，〈鸛蝶情深73年，白言妻子叶青逝世〉，《联合早报》，2016年6月17日。
- [12] 据独立研究员苏章恺的分享，导演罗马最初只设计了阿牛这角色交由野峰来演，但在上官流云（1922-2002）的推荐下，另外加入了周大叔的角色，并邀请王沙饰演。二战结束后，因为歌舞团、歌台表演以及电影歌曲的需求，新马音乐人开始着手创作歌曲，当中最有名的是来自马来西亚雪兰莪的上官流云，他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创

作了300多首流行歌曲（如《午夜香吻》和《新马来情歌》）。1952年，上官流云加入莺燕剧团演出《西厢记》，后加入新满江红歌台并搭档庄雪芳演出。他不仅能作词作曲，编剧、编导、主持、演戏无一不精，是难得的创作多面手。参考上官流云，《午夜香吻：上官流云怀感录》（新加坡，玲子大众传播中心，1996）。

- [13] 参见：〈早报悦读@NLB讲座：王沙野峰富正能量人生故事〉，《联合早报》，2019年11月25日。

延伸阅读：

- [1] 王振春，《新加坡歌台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 [2] 白言，〈从歌舞团谈到马来亚剧运〉，1951年至1987年的剪报。白言收藏，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 Gems。
- [3] 阎佰元（白言），口述历史访谈录音，1985年6月21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0578），卷1-24。访员：陈鸣鸾，赖素春。
- [4] 周维介，〈南飞雁——本土歌台文化的滥觞〉。《联合早报》，2019年12月23日。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领域为新马流行文化）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early Singapore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ctive in Singapore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60s, were performance groups that combined singing with dance. They attracted audiences with their modern, westernised and trendy styles, with repertoire also including comedic sketches and plays, predominantly featuring female singers and dancers.

In 1927, Li Jinhui (1891-1967) founded a song and dance school in Shanghai, later evolving into touring troupes and singing societi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Bright Moon Society (or Bright Moon Song and Dance Troupe). This was China's earliest professional song and dance troupe. In 1928, Li and his troupe performed several songs and dance dramas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in Singapore. His troupe nurtured many talented female performers, and many were swiftly scouted to join Shanghai's film industry. Song and dance troupes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raining and nurturing stars, and more groups began performing in Singapore. Singing, dancing, musicals and play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ir performances.

Actor Bai Yan (1920-2019), from the Silver Moon Song and Dance Troupe, said that it signed a contract with film empire Shaw Brothers to raise its profile. Consequently, troupe members enjoyed a steady income and performed in various locations, such as Penang and Ipoh. The literati also enjoyed performances by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getai*.

The 1950s saw a boom in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getai* show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long with a shift from dance dramas and plays to more singing and dancing. *Getai* star Chng Soot Fong founded a touring choir at 21 years old before venturing into the film industry with a cameo, and later rose to fame starring in the 1958 Amoy-dialect film *Wandering Songstress*. Other troupe members who went to Hong Kong and became stars of Amoy-dialect films were Yang Pei Yun and Kwan Sin Ngee (1927-1996).

Some troupes chose to feature more sensual dances, causing many to view song and dance troupes in a negative light. But most troupes in the post-war era touted a relatively serious repertoire.

The first Chinese-language film produced in Singapore after World War II, *Blood and Tear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1946), was financed and directed by Cai Wenjin, leader of the Bai Xue Song and Dance Troupe. The Shaw Brothers, which had operated cinemas and amusement parks before the war, also released *Song of Singapore*, *Second Motherland* and *Hard Times* after the war. All three films featured members of song and dance troupes that had performed in Singapore.

Singapore's renowned comedic duo Wang Sha (1925-1998) and Ye Feng (1932-1995) also transitioned from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getai* performances to the movie industry in the 1970s. They starred in four films of the *Crazy Bumpkins* series produced by Shaw Brothers, shot a number of films in Hong Kong and recorded many popular dialect comedy albums. This demonstra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the film industry. Members of song and dance troupes and *getai* were not only multi-talented, but also key players in Singapore's entertainment history.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首届“南华多元种族文化节”圆满落幕



文·欧雅丽

图·南华潮剧社提供

7月22日至26日，由南华潮剧社主办的首届“南华多元种族文化节”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行。这场历时五天的文化盛会，以“传承、交流、创新”为主轴，通过专题研讨会、主题展览、艺术工作坊、戏曲演出等多元形式，呈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中传统戏曲艺术精彩纷呈的面貌。

本届文化节不仅汇聚了歌仔戏、越剧、粤剧、潮剧、琼剧、黄梅戏等华族传统剧种，还邀请了马来戏曲和印度戏曲团体参与演出与交流，成为不同族群文化对话与相互借鉴的重要平台。

搭建交流平台 共议传统戏曲发展

由南华潮剧社和南洋学会联合主办的“多元文化传统戏剧研讨会”于7月22日和23日上午举行，为来自中国、越南和新加坡的艺术家、学者、戏曲工作者与观众搭建了一个文化对话的平台。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研讨会在议题设置上注重不同领域内容的交叉，并安排对谈人深度回应学术报告，相互启发，打开研究思路；同时回顾传统戏曲在重要历史阶段的演出形态，借此观察戏曲在不同国家发展的共性与特性。

来自新加坡、中国、越南的学者及艺术工作者围绕传统戏曲的保护与传承、跨文化传播、戏曲教育、青年观众培养以及数字时代的艺术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其中，关于马来与印度跨文化戏剧的讨论，也是对新加坡戏剧发展的开拓性探索。与会者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路径与未来可能，提出了多视角的看法。

研讨会既关注戏曲艺术的历史积淀，也着眼于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多位学者指出，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之下，传统戏曲的发展不仅需要坚守艺术本体，更需要积极寻找与现代社会的连接方式，让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长期以来，不同族群的传统戏剧在新加坡并存发展，不仅保存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也在长期交流之中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为传统戏曲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7月23日上午举行的圆桌会议，汇集了新加坡几个华族戏曲剧种的团体负责人，包括潮剧的卓林茂、粤剧的陈聆孜、黄梅戏的许素珍、歌仔戏的庄惠煊、琼剧的符青云，分享各团运营的经验与对本地传统戏剧未来发展的思考。



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马炎庆（中）主持开幕仪式

July 2026, Singapore
2026年7月·新加坡

Co-organized by
联合主办

南华潮剧社 南华

7月23日上午的圆桌会议，邀请几个华族戏曲剧种的团体负责人分享发展经验



《大闹天宫·戏聚西游》通过演出与互动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让观众近距离体验



戏曲展演汇聚了各种族、各剧种的演出



嘉宾体验全球首部VR戏曲微电影《典妻》

设于华族文化中心一楼广场的主题展览，也通过历史图片、演出服饰、戏曲道具以及影音资料，向公众系统呈现不同剧种的发展历程，让学术讨论进一步延伸至公共文化空间。

好戏连台 多元文化绽放光彩

除了理论层面的交流，连续数日举行的戏曲展演更成为文化节最引人瞩目的环节。

23日下午开始，七楼多功能厅陆续上演多场精彩节目。《大闹天宫·戏聚西游》以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为基础，通过演出与互动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让观众近距离体验戏曲身段、武打技巧以及舞台表演艺术的魅力。

《唱·出多元风——响·彻狮城韵》则汇聚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艺术工作者，通过音乐搭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新加坡多元社会和谐共融的独特景观。

《戏剧·无界》马来、印度和华族戏曲联合演出，更突破了剧种与族群之间的界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的同台合作，以创新形式诠释传统艺术，让观众得以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戏曲文化。

而《戏梦英雄·百炼成帅》则集合老、中、青三代演员，以精湛的唱腔与扎实的武戏功底，

再现戏曲舞台上的英雄群像。作为本届文化节的压轴演出，《戏聚南华·盛世华章》汇集京剧、越剧、黄梅戏、潮剧、粤剧和琼剧六大华族剧种，通过经典选段联演的形式，呈现中华戏曲艺术丰富多彩的风格面貌，也让观众得以在同一舞台上感受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

当传统戏剧遇见科技 开启戏曲新体验

由南华潮剧社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全球首部VR戏曲微电影《典妻》在开幕礼上亮相，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这部作品以传统戏曲故事为基础，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传统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空间界限。观众戴上头戴式显示设备之后，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能够置身于故事情境之中，以更加立体、沉浸的方式体验戏曲艺术的魅力。

与此同时，上海戏剧学院带来的《遇见东坡》也以VR技术重构苏轼的人生旅程。观众可以在沉浸式空间中自由行走，与历史人物“相遇”。

首届南华多元种族文化节不仅展示了传统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兼容并蓄、不断创新的精神气质。

(作者为本刊总编辑)



姓氏宗亲会馆领袖 与徐芳达部长午餐交流会



文·陈洁莹
图·编辑部

7月1日中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在大巴窰会所举办了一场会馆领袖与部长午餐交流会，邀请12家姓氏宗亲会馆的代表，与国家发展部长兼华社联络组主席徐芳达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宗乡会馆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同出席交流会的还包括两位华社联络组成员——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铭，以及义顺集选区议员李蕙莹。

午餐会开始，与会领袖依次介绍自己及所属会馆，让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多位会馆领袖拥有多年会务经验，他们分享了参与会馆工作的亲身经历，以及在组织管理和会务运作方面的心得。与会人员相互交流、彼此借鉴，现场气氛十分融洽。

以创新方式吸引年轻人

交流会上，徐芳达部长首先谈到会馆年轻化

的课题。他指出，会馆当前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是能否让会员，尤其是年轻人，感受到加入会馆的价值。

徐部长表示，给年轻人提供接触传统文化、拓展社交圈与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这些都可以成为会馆的核心优势与吸引力。关键在于，会馆如何以贴近年轻人的方式来呈现这些价值。

徐部长强调，年轻人并非对传统文化毫无兴趣。会馆能否吸引他们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运作方式是否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并贴近年轻一代的兴趣和需求。会馆可通过更具创意和时代感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例如举办形式新颖、内容有意义的活动，让年轻人产生共鸣，进而更愿意参与会馆事务。

谈到推动会馆年轻化的具体举措时，徐部长以“华社领袖班”为例，肯定这项课程在培养新一代华社领袖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尝试。他对首届课程获得热烈反响表示欣慰，也呼吁各会馆继续支持后续课程，踊跃推荐合适人选参与。

善用科技推动会务现代化

在会馆现代化方面，徐部长建议会馆善用新



“午餐交流会”与会者大合照



张氏总会会长张学彬（右一）分享凝聚会员的实践经验

科技与人工智能，提高会务运作效率，并减少人力与行政成本。

近年来，宗乡总会多次举办相关讲座和课程，协助会员团体及公众掌握人工智能工具、提升人工智能素养，以适应时代发展。宗乡总会也与新加坡社科大学合作，为会员团体开办一系列培训课程，当中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课程。

搭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桥梁

新移民融入也是当天交流的重要议题。徐部长指出，引进新移民对于应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生育率偏低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他呼吁各会馆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多种形式协助新移民认识和融入本地社会，并特别关注年轻家庭及第一代新移民的需要。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表示，新移民融入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持续耕耘、长期投入的工作。

蔡会长也提到今年5月，宗乡总会领导层与七大发起会馆领导、以及新移民团体代表进行了一场午餐交流会，分享各社团在协助新移民融入

方面的经验，并探讨如何继续发挥宗乡团体的桥梁作用，促进社会融合。

以会馆活动凝聚会员

新加坡张氏总会会长张学彬在会上分享了该会凝聚会员的实践经验。为了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张氏总会每星期举办名为“回家吃饭”的聚餐活动，鼓励会员经常回到会馆相聚。张会长表示，活动最初只有十多人参加，如今参与人数已增加至80多人。这显示越来越多会员，尤其年轻会员，与会馆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这项活动为会员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通过轻松自然的聚餐形式，让会馆成为会员能感受到归属感的场所。

为新移民提供接触社群的渠道

新加坡白氏公会副会长白平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分享会馆在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许多初来新加坡、对本地社会不熟悉的新移民，缺乏了解与接触会馆及社区组织的渠道，不知道身边有哪些社群可以参与，也不了解可以通过会馆结识朋友、获取资讯，更好地融入社区。

与此同时，会馆也面临难以主动接触新移民的问题。因此，如何在会馆与新移民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渠道，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白副会长回忆，自己刚到新加坡时，正是通过加入白氏公会，才有机会认识更多朋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人际网络，并在新加坡找到归属感。

题图说明：

与会者在宗乡总会“同行绘新”匾额下合影。

后排从左依次为：新加坡陈氏总会会长陈永祥、新加坡颜氏公会会长颜长江、新加坡黄氏总会代会长黄俊兴、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会长蔡钦华、南洋胡氏总会主席胡德成、白氏公会副会长白平、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第一副会长郭绪泽、南洋梁氏公会署理会长梁伟利；

前排从左依次为：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会长林清荣、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会长吴信财、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铭、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宗乡总会秘书长吴绍均、义顺集选区议员李蕙莹、新加坡张氏总会会长张学彬、新加坡李氏总会会长李添南

（作者为本刊编辑）

“爱国歌曲大家唱”迈入第20年 千人同声唱响家国情怀

文·陈洁莹 图·编辑部

一年一度的“爱国歌曲大家唱”于7月25日、26日在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举行，为邻里提前带来浓厚的国庆氛围。

本届活动继续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两天活动集合舞台表演、嘉年华游戏及手工制作等项目，共吸引约5,500人参与。

今年的主题“心系20”，不仅标志着活动迈入第20个年头，也寄托了不同族群和背景的居民心连心、共同为新加坡庆生的美好愿望。

红色人潮汇聚大巴窑

首日活动开始前，现场早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衣的观众。场内座无虚席，场外仍有不少居民排队等候入场。从远处望去，一片红色人潮在广场上涌动，国庆气氛格外热烈。

晚上7时，活动在趣味游戏“节奏单词挑战”中拉开序幕。参与者须跟随音乐节拍，唱出屏幕上出现的新加坡美食、地标等词语。现场反应热烈，主持人还临时增加游戏场次，让更多观众能够尽兴地参与其中。

随后，李伟崧音乐学院四位女歌手演唱经典歌曲《城里的月光》；崧崧少儿合唱团则以清澈童声带来《想你的365天》，熟悉的旋律唤起不少观众的共同回忆。



不同族群歌手同台献唱，欢庆新加坡建国61周年



首日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梁振伟（中）与主办方代表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二）、秘书长吴绍均（右二）、理事陈展鹏（左一）在台上同唱爱国歌曲，挥动国旗



活动第二日主宾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铭（左三）与碧山一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右二）、宗乡总会代表在台上宣读国家信约



惠安公会带来葫芦丝表演

回望20年，共话团结同行

现场播放的《NDSA Evolution》短片，通过历年影像回顾“爱国歌曲大家唱”20年来的发展历程，带领观众重温活动一路走来的珍贵时光。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梁振伟作为首日活动主宾，在“心系20”互动展板上贴上写有名字的心形贴纸，与民众共同见证这一重要里程碑。国歌响起时，全场观众肃然起立齐唱国歌，并宣读国家信约。梁振伟表示，这是他第二次参与“爱国歌曲大家唱”，他感谢主办方20年来持续举办这项富有意义的社区活动。他特别提到，今年适逢国家信约推行60周年，意义格外深远。随后，他与现场民众共同高喊：“祝新加坡61生日快乐！”

第二日活动主宾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铭也在致辞中呼吁国人继续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他同时向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长辈致谢，肯定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为今日繁荣的新加坡奠定了基础。

两位主宾都感谢主办方长期举办这项富有意义的活动，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居民通过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相聚一堂，在歌声中“心连心”，共同表达对国家的认同与祝福。

四大篇章唱出共同记忆

首日歌唱环节分为“心系家园”“心系青

春”“心系初心”和“心系未来”四个篇章，由叶玉棣、范平庚、易薇倪、李泓伸、Yohannis Kasmani等歌手同台献唱。

《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等爱国歌曲唱出团结与种族和谐的共同愿景；《恋之憩》《麻雀街竹枝》等新谣音乐，则以熟悉旋律带领观众回忆早年的本地生活。

演出期间，观众挥舞国旗、随着音乐摆动肢体，并以掌声和歌声回应台上歌手。歌手也不时走入观众席，与民众近距离互动。

活动还穿插“心之所向”选歌游戏，由现场观众以欢呼声决定演唱曲目。互动环节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整场活动不只是表演，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演唱会”。

同声歌唱为首日落幕

活动尾声，现场播放“心系20”签到活动的缩时影片。展板上的数字“20”逐渐被一颗颗红色爱心填满，记录了居民共同参与，也象征着活动20年来凝聚社区的足迹。

最后，主宾、主办方代表和歌手一同登台，带领全场合唱《Stand Up for Singapore》和《We Are Singapore》。在嘹亮歌声与挥舞的国旗中，首日活动圆满落幕。

第二天，活动延续欢乐气氛，居民通过歌舞表演、嘉年华游戏和手工制作等项目欢聚交流，在轻松互动中继续庆祝国庆，也为2026年“爱国歌曲大家唱”画下温馨句点。

(作者为本刊编辑，更多活动图片见封底)



在文字里慢慢《懂得》



文·林映慧

图·予安（李亦欣）

身

为记者，我每天都在听别人分享故事，也习惯透过文字或影音将它们记录下来。认识予安多年，她也在做一件相似的事——把生活中容易忽略的片刻，一一写下。

过去，我偶尔会在社交媒体读到她分享的文字，也常在聊天时听她谈工作、生活和写作。一直到《懂得》出版，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完她这些年来的文字，重新认识这位熟悉的学姐。

成长 慢慢懂得的旅程

书中有一个篇章写予安雨天走进咖啡馆，却点了一杯冷萃耶加雪菲来比喻大学时“踏上人烟稀少的小路”，让我想起自己当年选择到中国留学的经历。

四年的大学生活，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原有的想象，真正留在上海校园的时间不过一年多。那段日子，我也曾反复问自己：当初义无反顾地远赴复旦大学，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决定？如果当年留在新加坡读大学，人生会不会截然不同？

多年后回望，我仍会想起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或许，每一条少数人走的路，都有旁人看不见的挣扎，也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这种对成长的思考，也贯穿《懂得》的许多篇章，包括在每年生日写给自己的文字中，予安都坦率地写下工作上、心态上的转变，以及对自己的期许。

《懂得》吸引我的地方，正在于它不急着想告诉读者人生该怎么走，而是诚实记录成长路上的不确定、选择与坚持。成长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更多时候，是在一次次选择后，学会与自己的决定和解，并坚定走好属于自己的路。



予安新书《懂得》

在文字里 看见自己

在后记中，予安写到：“人与人之间，往往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共性，远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相似。”我想，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我阅读《懂得》时的感受。书里写的是她一个个人生片段，却也让我不断想起自己的经历。

读到《你的华语真好，你是新加坡人吗？》时，我不禁莞尔一笑。一样到中国求学、生活，这句话我也听过无数遍。乍听之下像是一句赞美，却也让我不断思考，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语言、文化与身份。

《终极浪漫》写予安带着妈妈旅行的点滴，让我读到了时间的珍贵。工作以后，我越来越明白，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更需要主动留出来。所谓终极浪漫不是做了什么独一无二的事，而是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共同创造回忆。

我也特别喜欢《从前慢》，谈到明信片包含的心意、文字的温度，以及漫长邮寄抵达后带来的回忆。

“这个多变而又太轻易将什么取而代之的年代，我倒是希望明信片这种通信方式别消失，就当留个这个时代静下心来书写三言两语的空间，以及一种从前慢的生活情怀。”

新闻工作让我习惯了追赶速度，采访讲求即时，新闻讲求时效，手机里的讯息也总是来得快、回得快。也因此，读到这一篇章时，我特别有感。它提醒我，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愿不愿意在匆忙的生活里，将时间留给彼此。

身为学妹，我很骄傲身边有那么一位出色的学姐把十年的书写集结成书；身为记者，我更明白，坚持以文字记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资讯更新飞快、人工智能逐渐改变创作方式的今天，她依然坚持以中文、以原创、以文



予安201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



本文作者（左）在《懂得》新书发布会上与予安（右）交流

字、以生活为素材把时间的足迹记录下来。

或许《懂得》最珍贵的意义，在于让不同的人因文字而看到自己，看到彼此，因共鸣而慢慢懂得。

予安，本名李亦欣，土生土长新加坡人。《联合早报》副刊专栏作者，95后职场打工仔。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毕业于立化中学与上海复旦大学翻译系。希望在快时代里，借由文字予人温暖与安心。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咖啡乌

文·翁维才

7月7日 晴

他个子并不高，每次都穿着纯白色背心和蓝色格子短裤，手中拄着拐杖，脚踩着黑色的人字拖。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组屋楼下的长椅上，直到天黑才会渐渐地起身回家。

我每天都会经过这张长椅到附近的小贩中心买饭吃。每当他看到我经过时，都会微笑着点头，我也会向他打声招呼，但也从未说过一句话。

7月8日 晴

今天，我在往小贩中心买午餐的路上时，他向我招手了。我往他的方向走，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了钱包，再挑出了两块一元硬币。“阿弟啊，我乎你镞，你欸使帮忙我买一包咖啡乌袂？^[1]”他满眼期待地看着我，以流利的福建话提出了诉求。不得不承认，我当时确实有些纳闷，虽然我从家里人那里学会了点福建话，但由于我从未和他聊过天，他应该不晓得这回事。不过这几句福建话倒是让我感到些许亲切，我思索着毕竟也顺路嘛，所以就答应他了。他又把钱塞到了我的手中。我本想推辞来着，毕竟我偶尔也会在买午餐时多买个饮料，更何况这咖啡并不贵，就当我用平时点饮料的钱来请他喝咖啡了。但他硬是要让我收下，我也只能带着他的两元，往小贩中心买咖啡去。

“爱金风欸，彼间欸咖啡乌好饮。^[2]”我点了点头，快步走到了小贩中心，买了午饭后便为他打包了一袋咖啡乌。在把咖啡交给他的同时，我也将剩下的八毛钱归还给他。他开头并没有收下，说是犒劳我的帮助。但我想这八毛钱终究还是他的钱，而且他给的两元我本来也没想着收，所以我还是坚持把零钱还给他。

7月10日 晴

阿伯又让我帮他买咖啡乌了。同样是以福建话跟我说，同样是金风的，同样是两块钱。我也同样地在买完午饭后给他买了咖啡，同样地归还了那八毛钱。他说他明天还会在这里，还嘱咐我说如果他还没到的话，就把咖啡挂在长椅的角落上，咖啡的钱他后天再还我。我答应了他，但也告诉他不需要付我咖啡的费用，他却只是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7月21日 晴

接下来的这几天，阿伯都会在我经过长椅时喊我到身边，并让我帮他带包金风的咖啡乌回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不需要付我钱，但他每次都会把那两块硬币塞在我的手中，而我也会在买完咖啡乌后把零钱还给他（虽然说他起初仍会推辞，但最后还是都欣然收下了）。

阿伯对面的长椅也偶尔会坐一些乐龄人士，他们都会和他聊天，说的自然是福建话。老实说，我也挺希望和他们一块聊会儿天的，了解他们的日常和一些我从未听说的，关于这里的故事。奈何自己的方言程度有限，而且每次碰见他们都是在自己刚刚从小贩中心买完午饭准备回家吃的时候，所以每一次和乐龄人士的接触都非常短暂。话虽如此，他们的谈话间往往都会透露出一种我在其他时候都无法感受到的温馨。

8月8日 晴

昨天下了一场大雨。或许阿伯也料到了露天的长椅今天会湿吧，又或许他今天纯粹想在家里待着，今天一整天都没见着他。其实说来也挺惭愧的，虽然我每天都会给他送咖啡，但从来没有真正跟他聊过天，也未曾好好地了解这位一直都在和我保留一袋咖啡关系的街坊邻居。我想，认识了他这么久，是应该好好和他说话了。

8月9日 阴

今天刚好是个公共假期。家人都出门了。我也早些下楼吃饭去了，所以在经过那张长椅时，阿伯还没下来。我还是按着日常惯例，在吃完饭后从金风咖啡档买了袋咖啡乌。而在我往回家的路走时，果然看到他坐在平时的长椅上了。“阿伯，今日我请您饮咖啡乌。”我把那袋咖啡交到了他的手上，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再试着以有限的方言词汇量跟他沟通：“阿伯，我看您达日

也会落来置这头坐，是因为这头会较凉吗？^[3]”

“无啦，就是置厝里一个依，无聊就落来坐啊。”阿伯看到我并未在送他咖啡后离开，仿佛有些讶异，但依然以流利的方言回答了我：

“有时也有朋友来这头坐，甲伊依讲淡薄话也不坏。^[4]”

阿伯说，他家里有个独生子，孩子也偶尔会来探望他，但毕竟住得远，工作也特别忙，所以父子俩一般都是聚少离多。他还有两个在上小学的孙子，但他们都不会说方言，甚至连中文也只会基本的单词。我静静地看着他，只见他的眼神颇为深邃，眼角的皱纹也似乎隐藏了多年未展开的隔阂与思念。我听着他说的话，心中却多了几分感慨：自从华语和英语成为我们的共同语之后，我们社会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社会中老一辈的人们打小就说方言长大，对华语并不如我们熟悉、流利，更不用说和汉语相差那么大的英语了。而我们的方言群体，也因为这种隔阂逐渐消减。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吧，我才会阿伯对我说方言时感到莫名的亲切，才会想要帮他买下那包咖啡乌。

我们接着在长椅上聊了很久。正在我准备起身离开时，阿伯却说了一句我难以忘记的话：“阿弟啊，你欸福建话讲欸不坏。这阵的少年唔是讲红毛话就是讲华语，拢袂晓讲福建话欸。明日有时间搁来这头甲我讲话呀。^[5]”我欣然答应了他，在回家的路上却是不断地想着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集体，我们为了发展究竟放弃了什么？

8月18日 阴

自从那天开始，我每当经过那张长椅都会跟阿伯聊会儿天，他也会跟我说很多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他后来要我帮忙买咖啡的次数也逐渐变少了。

上周六，阿伯从我手里接来咖啡乌就起身回家了，平时深邃的眼神也难得发起了光。我心中有些疑惑，便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我的仔今早乎我打电甲我讲，伊agar四点爱来看我，今日就早转咯！”^[6]他露出了自豪且满怀希望的笑容对我说道。我也面带笑容地朝着他点头，目送着他一步步走到他所居住的组屋底下。

自从上回和他寒暄之后，我经过那张长椅时就再也见不到阿伯，也不知道他最近过得怎样。我只能既担心又期待地等着他下楼到长椅上，

但他自那天起偏偏就没有回来过。或许他的儿子当时对他说了什么吧，让他选择不再下楼了；或许他的儿子决定让孙子暂时和他住了吧，使他因为忙着照顾孙子而没时间下楼了；又或许……

今天，收音机里播放了那首周杰伦的《外婆》，当歌词唱到那句“她要的是陪伴，而不是六百块”时，我便不禁想到了阿伯和他的独生子，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阿伯和孙子因语言障碍而近乎无法顺利沟通的场景。

9月7日 微雨

听那些之前坐他对面的乐龄人士说，阿伯的孩子在半个月前让他搬到离这里特别远的新组屋区，和家人一起住了。我自然为阿伯一家能够在一起高兴，但阿伯应该偶尔也会想念金风那包热腾腾的咖啡乌吧……

长椅上偶尔还会坐一些歇脚的街坊邻居，有等着校车送孩子回家的年轻父母，有刚刚下班的中年男子，还有和邻居朋友聊着天的家庭主妇。但那句句温暖的福建话已渐渐被标准的新式英语代替了。

注释：

[1] 译文：阿弟啊，我把钱给你，你能帮我买包咖啡乌吗？

[2] 要金风的，那间的咖啡乌好喝。

[3] 阿伯，我看您每天都会下楼到这里坐，是因为这里会比较凉快吗？

[4] 没啦，就是家里（就我）一个人，（感到）无聊就下楼坐。有时也会有朋友来这里坐，跟他们说点话也不错。

[5] 阿弟啊，你的福建话说得不错。现在的青年不是说英文就是讲华语，（基本上）都不会说福建话。明天有时间（的话）再来这里和我说话呀。

[6] 我的孩子今早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大概四点会来探望我，（所以）今天就早点回家咯！

随庭评语：

这篇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书写了年轻人“我”与一位年长阿伯因买咖啡乌偶然相识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日记体让读者能深入“我”的内心，跟随第一人称声音观察思考，不仅展露着两代人之间社交隔阂如何松动的状态，也展现出新加坡语言文化传承的困境、年长一代老年生活困境等复杂的问题。从日记体也看到，尽管“我”是观察记录阿伯的视角，但“我”也在被这场相遇影响改变着。

诗三首



文·林高

读九十以后趴趴走 ——赠周槃以致意

近日读周槃先生之诗作《我们趴趴走及其他》，喜欢。九十二高龄而诗心更轻盈活泼，所谓返老还童庶几如此这般。一时间，我的诗一路领着我的语言，却亦是，我的语言带上我的诗，所乐也趴趴走，只见一只白蝴蝶飞到梦里来。

快哉！老诗人
把衣衫又清洗过
绞干
晾在晨早的阳光
吹来静谧，释出芬香

穿上凉凉爽爽
不有待于蓬莱的好风
不有待于极乐的清唱
不争论有亦是无，空不是空
放下身家。只管趴趴走
是的，我们
走向月亮和太阳
经过火星和木星
风呼啸着
云雾迷漫^[注]
只管咀嚼
坊间一小方块饼干的原味

就坚持就固执
海枯了石烂了
也不能改变我
而我改变了我
直到又霜又雪
空寂寂淼茫茫
忽降生一只青鸟
且翱翔
是春天又是秋
是野火又是灰
忽降生一只青鸟
且环视
且穹苍

注释：

此二句引自周槃诗，刊于5月15日《早报·文艺城》。



怎么说呢

栀子花开
一道芬香筑起一道树篱
自外婆家东侧小溪边上
延伸到现在
早晨八点左右
唤醒我看窗外
过七十几了，早已瓜熟蒂落

这世上的语言就斑斑驳
无论怎么苦心经营

夏日荷叶田田
一支伞撑起一片翠色
天空下荷花开
池塘正在旺盛
正在闪烁纯净的光泽
悠悠清清的芬香
早晨约九点半
唤醒我看窗外
过七十几了，昨日的痛还痛

这世上的语言就凋零零
结子，又新生

火光

一件一件收集
变成一座废墟
着火燃烧起来
气势飞腾
竟然五颜六彩
众目睽睽之下
浓烟冲天

(作者为本地知名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淡滨尼北

淡滨尼镇的绿芽新枝



文图 · 李国樑

十年前，笔者在《源》“旧貌新颜”栏目写下《从田园风光步入摩登时代的淡滨尼》。当时这个昔日的荒郊乡野，已蜕变为东部区域中心，并荣获“世界人居奖”（World Habitat Awards）。

十年风雨几番新。商场人潮仍然络绎不绝，圆巴刹依旧热闹，但镇貌已悄然再变。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淡滨尼天地（Our Tampines Hub）正式启用，将建屋发展局、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食肆等设施汇聚一处。淡滨尼战备军协俱乐部前的山丘与青年改造所也被夷为平地，正在兴建更多新住房。

如今淡滨尼人口逾29万，比十年前增加约两成，当下主要在北区扩展，面积几乎相当于再增建一个类似碧山的中型新镇。

红土下的沙场岁月

淡滨尼得名于淡滨尼树（Tempinis）。一个甲子前的淡滨尼地博人稀，10公里长的淡滨尼路从后港六英里（Upper Serangoon Road）贯穿到樟宜路上段（Upper Changi Road），淡

滨尼路两旁都是散布的村落。这个古老的冲积层平原区，表层是约一米深的红土，其下是厚达200米、民间称为“白格”的沙层，再往下则是花岗岩。这类地层结构的形成期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这种地质条件，使这里在上世纪中期成为理想的采沙地点，也为后来大规模建设提供稳定基础。

1960至80年代，新加坡为了创造土地资源而大规模填海。东海岸与樟宜机场填海工程，淡滨尼成为重要的沙土供应源头。鼎盛时期，淡滨尼有20多个采沙场，累计开采约4500万立方米沙土，相当于将近2万个标准比赛游泳池的容量。淡滨尼10道的淡滨尼矿湖与勿洛蓄水池，都是昔日的沙场遗址。如今湖水平静，壮观的沙丘在阳光下，有如闪闪发亮的黄金，提醒人们新加坡东部的采沙岁月。

采沙场的运作方式

采沙场的运作与马来西亚锡矿场的“金山沟”类似，业主取得经营权后首先砍伐树木，挖掘分别储存雨水和泥浆的池塘。基础建设包括搭

淡滨尼北地形图
(根据2026年谷歌地图绘制)

1. 淡滨尼新镇初建时的圆巴刹
2. 淡滨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3. 淡滨尼镇中心步行街构思
4. 淡滨尼生态园 Tampines Eco Green
5. 蜻蜓池 Dragonfly Pond
6. 扩建的淡滨尼北早期组屋
7. 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 UWCSEA
8. 淡滨尼北组屋边缘
9. IKEA Tampines
10. 九仙宫（玄女妈宫）
11. 白氏公会九天楼
12. 新生水库“Tampines UFO”
13. 汉阳村地标：好年海鲜村
14. 淡滨尼矿湖 Tampines Quarry
15. 淡滨尼沙丘 Tampines Sand Dunes



建淘沙架，在水池与沙场间铺设水管，将收集沙土的沙橐安装在行家称为“格子”的隔间。此外就是添置简单的机械，包括铲泥机、抽水机、水笔、过滤网等。

准备就绪后，工人利用抽水机和水笔将泥沙冲洗、抽送至淘沙架过滤，再储存在沙橐备用，残余的淤泥则引到泥池。

沙橐的结构像一座巨大的木架。早期工匠无师自通，逐渐建立起一套沿用多年的技术规格。至于格子的多寡，则视沙场规模而定，一般可同时为10辆罗厘装沙。

最常见的运输罗厘，是承载量约五吨的Bedford J6。每天清晨J6在格子前列队，等候工人装沙。高峰期，罗厘每天从淡滨尼沙场载出1500至2000车次。罗厘司机装沙后给格子工人几毛钱喝咖啡，这是当年的行业惯例。这笔累积下来的“咖啡钱”，比每月百多元的薪酬优厚得多。

开采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取舍

新加坡自治时期，建屋局每年赶建一万多个组屋单位，吸引投资家进军采沙业。业主贪图方便，将淤泥排放到沟渠河流，使到淡滨尼经常淹水，对农民的生计造成严重冲击。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有些业主投诉申请不到

执照。李光耀将矛头一转，表示签发准证必须考虑到附近农民，沙场头家赚钱，农民的生活却受到阻滞，若政府要求业主给予农民几千元赔偿应该不以为过。这番话使到沙场业主哑口无言。

不过说归说，两个年代以来，采沙的模式没有什么改进。1981年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混凝土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公开指责小型沙场业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政府必须耗费几千万元公款来收拾残局，有些破坏甚至无法弥补。政府衡量大局后，唯有禁止传统式采沙作业，那些能够使用先进器材和妥善管理的业者才能继续经营。1991年最后一个沙场停止运作，当局到处填土补洞，淡马锡理工学院的部分校园，正好坐落在最后的沙场上。

40多年前，笔者迁至淡滨尼定居时，废弃的“巨坑”仍随处可见。纵然沙场消失，地貌改变，那段历史仍是淡滨尼迈入现代化前的重要篇章。



淡滨尼采沙场，整体结构与开采锡矿的金山沟相似（图源：白金山）



由于采沙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建屋发展局在淡滨尼到处“补坑”（图源：HDB Annual Report 1985/86）

汉阳村社会网络

汉阳村得名于邱汉阳。20世纪初，这位来自檳城的商人，在现今的淡滨尼北购置大片土地，经营橡胶园与农场。面积之广，相当于今日上万个四房式组屋单位。土地经营带动人口聚集，逐渐形成村落。

在汉阳村长大的街坊梁美石、白金山、姚利松、姚利光等人回忆，汉阳村位置适中，成为沙场业者与罗厘司机的重要联络点。如今淡滨尼路的好年海鲜村一系列店铺，就是昔日村民往来中心，附近设有商店、原产局、联络所、露天戏院、国泰克里斯（Cathay Keris）电影制片厂等。

汉阳村的原居民多为福建南安人，附近的乡村学校包括和星、新民、明新与育民；淡滨尼学校是唯一的英文小学。学生毕业后，多升读后港的光洋与新民中学，以及丹那美拉的圣公会中学。

公立新民学校与林子平

公立新民学校半个多世纪历史中，建国一代



公立新民学校是汉阳村的孩童报读的学校之一（图源：姚利松）

画家林子平曾担任校长32年，他的儿孙都是校友。他在二战后出任校长时，学校只有60多名学生，高峰期学生人数达到900多人。林子平退休时，周边村民已陆续搬进组屋区，学校因学生人数急剧下降而走入历史。林子平相信“一个画家应该画自己的乡土，如果脱离了乡土，就像树没有根，水没有源”。他捐出近300件作品给国家典藏，部分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示。

随着市镇开发推进，汉阳村居民迁移至淡滨尼或后港。虽然村落拆除，道路改线，但在早期居民记忆中，汉阳村仍是淡滨尼历史不可忽略的一页。

宗亲与家庙

除了学校与商业活动，汉阳村也孕育了以宗亲和庙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白氏公会与九仙宫（玄女妈宫）。

新加坡姓白的人士，先民多数来自福建安溪。白氏宗亲以百年前创建的九仙宫为家庙，供奉的道教神明九天玄女，在福建移民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白氏公会的前身香山白氏公所，初期在宫内活动。日后白氏公会先后在大坡（新那阁街 Synagogue Street）和新世界一带（仰光路 Rangoon Road）落户。迈入21世纪，白氏公会在九仙宫旁的土地上兴建九天楼，完成家与家庙的格局。顺便一提，这里就是前国泰克里斯电影制片厂的原址。

汉阳村附近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现代地标。白氏公会对面矗立着两座漏斗形水库，由于外型奇





淡滨尼路的两座储存新生水的水库，由于外型奇特，有人称之为“淡滨尼UFO”



白氏公会在九仙宫旁的土地上兴建九天楼，完成家与家庙的格局

特，有人称之为“淡滨尼UFO”。它们并非什么不明飞行物体，而是用来储存新生水的水库，合起来的容量相当于三到四个国际标准比赛游泳池。

从采沙场到生态园

淡滨尼仍保留着重要绿地。在淡滨尼河旁的淡滨尼生态园（Tampines Eco Green）成为自然教育场所，附近学校常安排学生前来探索。

生态园的原身是多个采沙场，填平后以几十年的光景让植被重新生长。园内三条越野步道穿过草地、池塘、沼泽与次生林，是观察鸟类的好地方。沼泽地是寻找水鸟的理想地点，雨林则可以同时感受到“四季”的变化，一片绿意中可见转红的“秋叶”，以及光秃的枝丫。

大家也可以寻觅野生动物中的“明星”，例如高大的白腹海雕、俯冲捕食的白领翡翠，以及比恐龙时代还悠久的蓝蜻蜓。

淡滨尼生态园（Tampines Eco Green）原身是多个采沙场，如今植被茂盛，可在水边发现比恐龙时代还悠久的蓝蜻蜓



淡滨尼北区延伸

在淡滨尼发展的初期阶段，建屋发展局耗时逾十年来安置3000多名村民，为建设基础设施腾出空间。

1970年代末，淡滨尼新镇开发计划正式启动，第809座组屋最先完工。1990年代中叶，世纪广场与淡滨尼广场相继开幕，淡滨尼正式脱离“新镇”的身份。

淡滨尼持续经历重

大转型。根据淡滨尼市镇理事会发布的“五年发展总蓝图”（2025年），淡滨尼将蜕变为“20分钟市镇”。这意味着虽然这里地广人多，通过公共交通前往最近的社区中心，所有行程均可在20分钟内完成。此外淡滨尼拥有20多处包括公园、花园及水道的绿地空间，从家门到绿地最多仅需10分钟。

淡滨尼北是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新镇”，包括大规模住宅扩建、通过跨岛线提升出行连通性，以及创造新商业和工业节点，让就业机会更贴近居民住所。

淡滨尼北被视为成熟市镇的“绿芽新枝”，象征着淡滨尼镇成长的演进轨迹。过去十年，原本森林茂密的北区已逐步发展为住宅社区，未来将新增超过2万个住宅单位，估计增加7万居民，让支脉继续延伸。

步行街愿景

随着人口逼近30多万，淡滨尼镇中心的功能也开始出现新的想象。

过去数十年，淡滨尼的发展重心在于建设住宅、交通和商业设施；未来的发展，则更强调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根据市镇未来规划，淡滨尼地铁站周边的三座大型商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邻近公共空间，将逐步加强步行连通性，部分道路预计转换为无车、宜步行的公共空间。

这种构想让人联想到日本一些著名商店街。人们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来，也会在街头停留、用餐、休憩和交流。对于老居民而言，这样的转变并非陌生。昔日汉阳村的店铺区和露天戏院，也曾是街坊相聚、交换消息和建立人情关系的地方。时代虽然不同，但人们对于公共空间与社区生活的需求，却始终没有改变。

淡滨尼的发展，是个阶段性转型的进程。白垩层依旧埋藏在地下，只是昔日的沙坑多被填平，村落化为组屋，矿坑长出钢骨与森林。淡滨尼北的出现，并不是一座新市镇的诞生，而是淡滨尼这个成熟市镇继续欣欣向荣的象征。对于老居民而言，那些沙场、村路和戏院或许早已消失，但它们并未真正离开，而是化作这座市镇的根系，默默地支撑着淡滨尼北这株不断萌发的新枝。

参考文献：

- [1] Building Our Tampines Home Together Now and Always, 5-Year Master Plan 2025-2030.
- [2] HDB Annual Report 1985/86.
- [3] Tampines,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ttps://www.hdb.gov.sg/about-us/our-towns-and-estates/tampines>, accessed on 28 July 2026.
- [4] 康秀金，“宜居淡滨尼 卫星镇芬多精之旅”，《联合早报》2020年11月26日。
- [5] 李国樑，“从田园风光步入摩登时代的淡滨尼”，《源》2017年第2期，总126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 [6] 李国梁，“淡滨尼的采沙业”，《联合早报》2022年8月25日。
- [7] 李庚洧，“淡滨尼五年发展总蓝图探讨打造新加坡版大阪步行街”，《联合早报》2025年2月22日。
- [8] 林方伟，“艺述岛国：吾画·吾土林子平”，《联合早报》2025年8月12日。
- [9] 孙靖斐，“白氏公会‘家庙’九仙宫 开放参拜不限姓氏籍贯”，《联合早报》2024年4月22日。
- [10] 谢燕燕，“曾任校长32年 林子平与400公立新民校友聚餐”，《联合早报》2018年8月6日。

题图说明：

淡滨尼北正在扩建中的新组屋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Echoes of the Sand Quarries: The Making of Tampines North

Tampines, once a r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s, farms and sand quarrie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one of Singapore's most populated towns.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ampines North has initiated a new phase in its narrative. As a continuation of an earlier piece published in *YUAN* a decade ago, we reflect on the past landscape and communities that once influenced the area.

Tampines is situated on the ancient alluvium formation, with a shallow layer of red soil sitting above substantial accumulations of sand and gravel. Created more than a million years ago, this geological feature has rendered Tampin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nstruction sand throughout Singapore's nation-building years.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sand mining was a significant local industry. At its peak, more than 20 sand quarries were active in the area, generating millions of cubic metres of sand used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land reclamation along the eastern shoreline. The industry utilised sand-sieving frameworks referred to locally as "palong" (sluice box), mechanical pumps that channelled slurry through filtering systems, and fleets of Bedford lorries transporting sand around the island. Unofficial customs also emerged within the trade, including minor tips given to workers. While sand mining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Singapore's development, it also created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water pollution and increased flooding. By the 1980s, more stringent regulations were implemented, and the last quarry in Tampines ceased operations in 1991.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industry, rural communities developed and flourished. Among these, Hun Yeang Village played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The community was named after entrepreneur Khoo Hun Yeang from Penang, who acquired a large tr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ver time, the village evolved into a hub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related to nearby plantations and sand quarries. Shops, coffee stalls and an open-air cinema along Tampines Road catered to both workers and residents. The community primarily consisted of immigrants from Nan'an in Fujian, China, and maintained a network of Chinese schools as well as Tampines School, the only English-stream school in the area. Religious and clan organisations were also essential to village life, including Kiew Sian King and the Peh Clan Association, which continue to maintain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community's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ngapore's urban development plans, the rural landscape of Tampine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public housing estates. Block 809, completed in the early 1980s, was the first residential block in the new town and signified the beginning of Tampines' evolution.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the region evolved into one of Singapore's largest regional hubs, with banks, shopping malls, a public library, a significant transport interchange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catering to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ampines North has signified a new stage in the town's progression. Design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current town, the region combines new housing projects with green pathways and an enhanc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mmunity initiatives such as Our Tampines Hub have further strengthened social cohesion by integrating recreational, cultural and civic services within one complex. At the same time, former quarry area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Locations such as Tampines Eco Green, previously part of the Tampines quarry scenery, now provide habitats for wildlife and opportunities for nature education, representing the ecological revival of past industrial land.

The story of Tampines showcases various dimensions of transformation. Beneath today's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lie traces of former kampong communities, sand quarries and farming lands. The rise of Tampines North does not repres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tirely new town, but the ongoing of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 builds on the previous one. Transforming red soil and sand quarries into lakes, parks and modern housing estates, Tampines shows how landscapes altered by resource extraction can be envisioned as vibrant urban communities while maintaining remnants of their history.

《源》

“本土文学”栏目

为进一步推动本地文学创作，《源》杂志“本土文学”栏目全年常设征稿，持续征集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鼓励创作者以文字书写本土故事。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散文、诗歌（须为未曾发表、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小说、散文约4000字

诗歌约1200字（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录用：《源》杂志编委会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刊登。作品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声明：投稿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所有条件与规则，方可参与征稿。

欢迎广大文友踊跃投稿，以文学之笔，共同书写本土故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
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
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若想阅读更多往期精彩内容，请登录网站<https://sfcca.sg/yuan/>，或者扫描二维码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i@sfcca.sg





- 主宾和民众为精彩的舞台节目发出阵阵喝彩 ①
 多元有趣的嘉年华游戏吸引小朋友参与，让一家人共享欢乐时光 ②
 华族舞蹈剧场带来了一支富有闽南特色的儿童舞蹈《斗阵来呷》 ③
 参与者将扇子浸入颜料中，制作出花纹独特的水拓扇 ④
 松松少儿合唱团以富有感染力的童声演唱《想你的365天》 ⑤
 梁振伟部长深情唱响爱国歌曲 ⑥
 民众发挥创意，制作独一无二的热缩片钥匙扣 ⑦
 ⑧